

老火车站连接万里茶道

每到大智路乘一号轻轨，眼睛老躲不开的老火车站四角塔堡，自1991年铁路外迁沉寂35年之后，终于罩上绿色纱网开始修缮。据悉，这里拟设万里茶道博物馆，城市中心将复活一段铁路记忆。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整整滚过120个年轮。1903年大智门火车站（后称汉口火车站）始建，1911年遭清军炮击损毁，1917年改建至今，堪称法式公共建筑的经典之作。2001年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艺术价值当之无愧，历史价值更为突出——我国早期火车站及中欧万里茶道的重要遗迹，在铁路发展史和对外交流史上均具里程碑意义。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我们江城长期受惠于“茫茫九派流中国”而九省通衢，自此又得益于“沉沉一线穿南北”而中原逐鹿，双重优势推动城市近代化迅猛发展，人说武汉是“铁路驮来的城市”不算过分。

120年过去，武汉一直担当交通枢纽，铁路遗存比比皆是，主要集中在汉口江岸和武昌徐家棚两个群落。余光中有言“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那么铁轨自身的记忆有多长？

2021年3月25日，前往江岸看看，碰到绿皮车进站，尚在用于内部职工通勤；一栋办公楼门口，“江岸车站”牌子也还挂着。谁料29日，媒体一起叹惋《123岁江岸火车站停用》，仅隔4天的个人日记，见证一段历史划上句号。

倒推123年，江岸车站始于1898年，无疑是铁字号元老。那时候，这个车站叫刘家庙，一个几乎各地都有的小地名，却连接风云激荡的大时代。1911年阳夏之战革命军驻守，1923年二七大罢工林祥谦就义，1949年武汉黎明解放军进城……

江岸车站近旁，一座著名的转车盘用于机车掉头，出自比利时设计师之手，文保人士为其保护呼吁奔走。2013年，它与江岸车站的站房、月台、信号塔，一同隐没江景楼宇之林。

江南的徐家棚武昌北站，詹天佑亲自选址，为粤汉铁路最北端终点。粤汉铁路1896年始建，磕磕碰碰40年，1936年才全线通车，与京汉铁路合为京广铁路。2018年5月10日，送走8304次市郊列车最后一班，武昌北站也完成历史使命。

时代前行，一如列车风驰电掣，搅起落叶纷飞，也能织出芳草如茵。徐家棚四美塘公园，薰衣草和油菜花，为铁轨、龙门吊、绿皮车和红喇叭雕塑镶边，主打“铁路遗址文化”工业风。这四美塘，因修铁路挖土方积水成塘，引来四个姑娘洗衣，称之“四美”。美好的传说，缠绕大站台牌楼，回荡机车库红墙，为年轻人打卡增添情绪价值。

徐家棚江边，火车轮渡码头遗址却鲜为人知。当年，粤汉京汉如牛郎织女，长江滔滔如银河迢迢，出现“武汉一大怪，火车要靠轮渡载”，直到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京广铁路一线牵。如今，铁轨安卧波涛，石墩坚挺岸坡，带着锈色与苔痕，顽强诉说“火车浮江”的传奇。

4月3日，《长江日报》传来新消息，京汉铁路最南端终点玉带门车站将“活化”归来，打造为遗址展示和茶道文化公共空间。

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万里茶道从帆船到火车，汉口从小商埠到大都会，以大智门火车站为代表的铁路遗存，把一座城市与世界的双向奔赴，表达得如此完美。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伟 胡蓉

唐云峰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老火车站连接万里茶道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86，武汉航空公司启航 / 王钢 韩泽宽

风雨同舟

<<<< <

12 向世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 冯洁菡（口述） 车璇 张梦圆（整理）

九城同心

<<<< <

15 翠染长江岸 蔬兴十亿业

——嘉鱼潘家湾蔬菜产业发展蝶变史 / 殷铁山

委员天地

<<<< <

23 金融变局中前行，政协履职里领悟

/ 车泽鹏（口述） 银华（整理）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27 钢骨闯商海，瓷心暖江城 / 于桂英

人物述林



- 32 熊秉坤：勋章，枪声，与溥仪的合影 / 彭 博
37 水利专家陶述曾的青山缘 / 张玉琴 孙君恒
41 陈时坚请梁启超来汉讲学 / 肖朝晖
46 不慕浮华，不逐红火：张舜徽先生追忆
/ 姚伟钧（讲述） 李思宇（访谈）

都市寻踪



- 48 近代汉口的民信局 / 王 耀 高艺丹
52 清末普爱医院的老照片 / 侯红志

往事漫忆



- 57 驰援响水沟：“一个都不能少” / 朱伟峰
62 祖父一封家书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 向虎雏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86，武汉航空公司启航

◇ 王钢 韩泽宽

轮印：40年——1986年4月2日，武汉航空公司获国家民航总局批准成立，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地方航空公司之一。历经三次历史性跨越，从一个无飞机、无航线、无运营基地、无办公场所的“四无”公司，实现了由小机型、短航线到现代化机队、广域航线的大飞跃。

1986年春天，武汉航空公司应运而生，以灵活务实的经营理念、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追求卓越的服务品质，在万里蓝天书写一段从小到大、由弱至强的壮丽航迹，在湖北航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开辟“第三航线”

1984年，国务院将武汉市列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

称的华中重镇，担当“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重大使命。

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是“两通起飞”，其中流通领域的改革推进相

这是一个创举！在中国，她是第一个地方性航空公司。随着一批架满货物的运输机跃上蓝天，飞向四方，武汉航空公司成立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

因为院长赵景阳对他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新航武汉军区空军支援武汉市开办航空公司的情况汇报，也给予了支持和表扬。

国内外二十多家通讯社、报刊、电台、电视纷纷发表消息、通讯、图片报道，对武汉航空公司的诞生作出高度评价；有的西方通讯社和报刊甚至把它的诞生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指导思想转变的重要信息。

“第三航线”，在共建的蓝图上开辟

去年六月，国务院将武汉市列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批准了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将发展成为“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国际国内商品贸易的枢纽中心。

驻汉空军党委一班人闻风而动，开始运筹。司令员武维元、政委康星火等象指挥一场战争那样，进行着出击的分析、探讨、论证——武汉市经济活化的困难何在？在交通、在信息，才能实现“内通”、“外通”，金融、物资、信息、人才交流比较发达，使空中运输力最薄弱，没有形成立体交通网络。

武汉的优势在哪里？在空中。武汉空军有着雄厚的空运力量。多少年来，运输机部队训练放风筝，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机上表演杂技飞行，浪漫，令人惊心动魄。

前着，像一只背驮着十字架的雏燕，要飞，而飞不起来；后者，像一颗断了尾翼的风筝，上天，就要“散架”。同顶一片蓝天，共饮一杯江水，为何不能互补长短而相得益彰呢？

决策形成了！

真可谓“改革贵有见略同”。武汉市长办公会对建立自己的航空运输体系在进行专题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空图上，标制着两条航线，一条是军事专用线，一条是民用航线。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武汉航空公司这个国内首家地方性航空公司隆重举行开业典礼，四架满载货物的黑燕从王家墩机场展翅凌空——“第三航线”在军民共建的蓝图上开辟了！

信誉，叩开了蓝色航空港神秘的大门

武汉航空公司开张营业了。但万事开头难，难得出人意料。转眼九月份过去了，新建的航空公路上除首航后连续几个架次外，门庭渐渐冷落下来。是公司不具备竞争和招揽客户的气势吗？不！武汉航空公司包租飞机，日运输吨位量可达数百吨。他们实行包机直达的运输服务模式，可以把货物运往全国的任何地方。调机之方便，启运之快捷，恐怕连某些国际航空公司都难以匹敌！然而，就象闪光的金子蒙着尘土一样，他们的优势还没被人们所发现。

怎么办？创信誉！他们派人到郑州、西安、成都、重庆等地专门寻找业务，服务送上门，湖北省粮油进出口公司欲运活鲜螃蟹到香港，与航空公司签定四十六个架次，一百六十多吨的运输合同。为了让货主满意，航空公司同有关部门一起，专门召开协调会议，每天早晨七时，飞机准时离汉起飞，直飞厦门。中午时分，一只只活鲜的螃蟹就在香港上市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过去，螃蟹陆运香港至少得要三四天，现在半天就到了！有人在香港现场拍摄的实物对比影相送到了武汉市部队游行，称赞武汉航空公司运活的螃蟹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以上；而外省通过另一渠道运活的螃蟹，成活率却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信誉之所至，武汉航空公司靠这条“信誉之道”赢得了大批客户。去年十二月，武汉市部队服务中心举办四国电脑展览会开幕式，可直到三日，还有相当一部分进口电脑和有关部件滞留在广州海关，航空公司连续派机，四日上午启航，下午就把货物运回武汉。

信守就是竞争的力量，良好的信誉，终于使武汉航空公司叩开了蓝色航空港神秘的大门。从去年十月起到现在，他们共飞七十四个架次，受到客户高度评价。

航标上，大写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宏观效益

武汉航空公司作为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短短的一百多天时间里，不仅没花国家一分钱，还差利税十五万多元。但是，开办武汉航空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追求公司本身的微观经济效益。在武汉航空公司的新航线的每一座航标上，都大写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宏观效益。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一位外宾打扮的中年人去大坪，神秘地走进了航空公司办公楼。从桌上的名片得知，来人是香港大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驻武汉的副经理妙德先生。他是为八十打棉的成衣运往香港而来的。八十打成衣，重量不过八百公斤，专机一飞即回吗？（下转第二版）



1985年1月26日《长江日报》报道

对较为容易，交通领域则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空中运输力量薄弱，尚未形成立体交通网络，而驻武汉空军拥有雄厚的空运力量。

6月，武汉市政府与驻武汉空军商定，以军民共建的形式，组建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武汉市拨款10万元作为开办费，采取包租空军

退役运输机的形式开展航空运输业务，暂用王家墩机场开航。

在共和国的航空版图上，原本标注着两条航线：一条军事专用线，一条国营民航线。9月9日，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举行盛大开航典礼，5架满载货物的银燕从王家墩机场展翅凌空，成功开辟了“第三航线”。

作为独立于国家民航系统外的地方性专业航空运输公司，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随着一架架满载货物的运输机飞向四方，这一创举为国内外30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称其为“全国第一家地方航空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变的重要产物、军民共建的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更是评价这一壮举“给中国的计划经济打破了一个缺口”。

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实行包机直达的运输服务方式，能将货物运往全国任何地方，日运输吞吐量可达几百吨，调机的便捷性和启运的快速性，甚至可与大型航空公司相媲美。1984年，公司安全飞行120多架次，



1986年5月13日，武汉航空公司举行开航典礼

运输物资420余吨，盈利10万余元。1985年3月1日，公司首飞汉口—宜昌客运航线的第一个飞行班次。1985年底，总共包用飞机201架次，其中货运192架次，载运货物744吨；客运9架次，运送旅客176人次，盈利超23万元，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武汉航空公司迎着改革潮头起飞

1985年1月，为加速民航建设，国务院批转民航总局《关于民航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有计划地支持地方兴办各类航空企业。

武汉市委、市政府抓住机遇，以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为基础，由武汉市交委筹资200万元作为启动经费，成立武汉航空公司。1986年4月2日，民航总局批准成立武汉航空公司，4月17日颁发经营许可证。

此前，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虽然规模较小、资本微薄，却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初步搭建专属于武汉地方的航空客货运



武汉航空公司总经理程耀坤

输网。它不仅在实践中探索出军民共建的发展路径，为武汉航空公司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储备与运营经验，更以“第三航线”的壮举，镌刻下探索与突破的时代印记。可以说，正是武汉航空运输服务公司的先行试办，为武汉航空公司的腾飞铺就了跑道。

然而，万事开头难，没有基地和飞机是最为突出的问题。200万元启动经费，甚至不足以购置一台中型客机的发动机。刚从空军机关领导岗位转任公司总经理的程耀坤却充满信心：“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绘出绚丽的画卷。”

为了解决飞行基地问题，程耀坤先后数十次跑北京，拜访70多个单位，盖了90多个公章，最终空军、总参破例批准武汉航空公司使用空军王家墩机场作为飞行基地。武航，成为全国唯一进入军用机场的地方民用航空公司。

有了基地，却买不起新客机，程耀坤将目光投向旧飞机。正好空军精减整编，有一批运输机退役，经过大修并通过适航检查，符合运营标准。程耀坤便将手头仅有的200万元，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先后购置4架

伊尔-14型飞机和2架运五型飞机。

有了基地，有了飞机，还要解决关键的人才问题。公司成立之初，仅有12名拓荒者，人才极度匮乏，于是“三管齐下”：依靠民航与空军支持、面向社会招聘、立足自主培养而破解难题。在空军部队，精心选拔一批优秀飞行人员。在民航院校及地方院校，择优录用一批机务、商务、后勤保障等方面专业人才。

当程耀坤带着相关数据与材料前往民航总局申报开航时，总局既感惊喜又颇为诧异。他们认为，创办航空公司绝非易事，不仅需要数千万元资金投入，更要历经数年时间充分筹备。然而，武航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闯出一片天地，不由称赞他们创造了现代的“东方夜谈”。

1986年5月13日，经民航总局严格考核验收，武汉航空公司开航，奇迹般的在“白纸”上起飞。开航典礼上，两架伊尔-14型客机从王家墩机场腾空而起，经天兴洲掠过十里钢城溯长江而上，经长江大桥至汉阳沌口，越过江汉二桥回到机场降落，全程飞



武汉航空公司航徽“黄鹤飞天”

行 20 分钟，数十名乘客在空中领略壮美的三镇风光。

飞机“空中游览”，成为武航献给武汉市民的第一份珍贵礼物。

武航坐落于白云黄鹤的故乡，航徽图案为“黄鹤飞天”，堪称武汉地域文化与航空精神的完美结合。一只昂首展翅的黄鹤，正向着地球经纬线冲天而起，象征武航立足武汉飞向世界。



1987年11月17日，武汉航空公司成功首航恩施典礼

三次跨越跻身地方航空公司前三

航空公司属于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化社会服务企业，高投入，高风险。武航推进每一项重大决策，迈出每一步步伐，都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风险。然而，武航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历经三次历史性跨越，实现从地方小型航运企业到区域骨干航空力量的华丽蜕变，铸就了湖北民航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开辟恩施航线，是武航生存发展的转折点，也是第一次历史性跨越。航空公司要发展，必须要有自己固定的运输航线。但武航只有专业飞行业务，没有参与航线经营。经多次申请，民航总局批给武航的唯一航线是武汉至恩施航线。然而，这条航线气候变化无常，加之恩施机场呈锅底状，地形十分复杂，不利于飞机起降，在民航史上摔过 3 架飞机，1983 年关闭了该航线。

面对这条“死线”，武航高层面临两

难抉择：飞，危险太大；不飞，没有航线，航空公司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考虑再三，先不急于做出决定，而是组织有经验的飞行人员对航线进行反复勘察试飞，获取大量数据。最终，顶住一片反对声，毅然做出决策：靠科学导航将“死线”飞活！

1987年11月17日，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下午1点36分，一架可载客36人的伊尔-14型客机从武汉机场腾空而起，历经1小时50分钟飞行，安全抵达恩施机场，标志着武航迈出正规空中客运的第一步。

为保障航线安全顺畅运行，武航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精心组织，认真飞行，将该航线视作连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线”“连心线”“政治线”，十余年间，安全飞行5000余班次，运送中外旅客逾20万人次，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随着恩施航线的顺利营运，业务渠道由省内拓展到省外，先后在甘肃、宁夏、四川等地开展人工降雨、飞播造林、农林灭虫、航空测量等专业飞行及旅游包机业务。

拓展省际干线，是武航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为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一家航空公司，如果仅局限于支线运营在省内往来穿梭，势必陷入原地踏步、难以突破的困境，干线资源才是航空公司的生命线。但在当时条件下，干线长期由民航直属公司专营，地方航空公司申飞干线尚无先例。

为打破这一行业“禁区”，程耀坤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一连数日住便宜饭店，吃街头快餐，挤公共汽车，往返于民航总局及相关部门，积极汇报，多方协调。经不懈努力，民航总局最终打破惯例，准予武航开通武汉至上海、温州、广州、重庆四条“热线”。此举让武航这家地方航空公司，得以名正言顺参与国内干线市场竞争，也为地方民航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1987年12月，武汉至香港航线开通，揭开了武汉航空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条直通海外的“空中桥梁”，极大增进与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交往。据有关方面统计，乘飞机来武汉旅游观光、投资经商及文化交流活动的外宾、港澳台胞等，由1979年占旅客总数的5%左右，上升到1988年的25%。

1989年，随着客运量的持续增长，武航亟需开辟更多国内干线，老式小型客机已难以满足运营需求，而引进新型大飞机又资金短缺。为了筹措购机资金，程耀坤走访了全省28家大中型企业，寻求合股经营。在武汉钢铁公司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的支持下，武航成功购置2架国产新型运七飞机。1993年初，又引

进2架运七-100型客机，运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后，陆续开展国内货运、空中旅游、地质探矿、特种保鲜保活、航空摄影等多种飞行作业，具备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全天候飞行能力，累计开通25条国内干线，构建起四通八达的航空运输网络。

引进波音飞机，是武航发展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中，只有依托先进机型构筑竞争优势，方能吸引客源、拓展市场。为此，经多方调研、科学论证，最终选定新一代波音737-300型客机，创下当年论证、当年签约、当年投入运营的行业佳话，其办事效率之高、引进时间之短，令许多国内同仁感叹不已。

1993年8月21日，武航首架波音737-300型客机自美国休斯敦飞抵武汉，顺利完成跨洋交付。赵宝江、王守海、赵零等市领导专程赴机场迎接。至1997年，共引进5架同类客机，标志着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实力跃居全国地方航空公司前列，实现“鸟枪换炮”的第三次跨越，迈入波音喷气式客机时代。



武航引进的美国波音737-300喷气式客机

然而，武航高层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航空业是一个高科技、全方位的行业，仅仅拥有波音飞机是不够的，还需具备驾驭它的实力和适应现代航空发展的运行机制。于是，围绕波音飞机的引进，立即着手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运行体系，并将加强壮大飞行队伍、提高飞行员素质列为首要任务，从全国各地引进 30 多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

飞行员，增强飞行实力。同时，投入巨资对所有飞行员进行“技术改装”，分三批送到美国进行培训，同时将美国教官请到公司亲手带飞。不出一年，从没有一个波音机长到拥有 10 多名能独立飞行的波音机长，令美国教官刮目相看，称赞他们为“亚洲一流”。

波音 737-300 型客机投入运营后，武航经营形势迅速改观，航线由 25 条增加到 40 多条，航线距离突破 3.5 万公里，航班密度由每周 10 多个增至 90 多个，年客运量由 8 万人次增加到 75 万多人次，进一步拓宽了武汉的空中交通走廊，为地方航空事业与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1996 年，武航实现旅游运量 75 万人次的历史性突破，人均创收突破 10 万元，经营效益斐然。

随着机队实力增强和航线网络不断扩展，武航开始向多基地运营迈进。1997 年 4 月 15 日，正值三峡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武航在宜昌三峡机场建立飞行基地，经营客货运输业务，为支持三峡建设、服务宜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武汉航空公司三峡基地开航仪式

1998 年，经过 10 多年艰苦创业，武航的航线纵穿南北，横贯东西。驻外办事机构遍布全国 20 多个大、中型城市，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常驻机构，成为全国投资最少、综合经济效益最好的三大地方航空公司之一。

从开通恩施省内支线航线，到逐步拓展省际航线，再到引进波音客机，武航成功实现了“三个阶段、两步到位”的发展规划，在全行业树立起独具一帜的鲜明形象。三个阶段为：第一阶段，用伊尔-14 型、运 5 型飞机开展通用飞行，开辟省内航线和跨省包机飞行；第二阶段，用国产运 7 型飞机过渡，开通省际及部分干线航班；第三阶段，引进波音飞机，进入涡轮风扇喷气机发展阶段。两步到位：第一步，打基础积累经验；第二步，引进大飞机，飞遍全国，争取更大发展空间。

正是依靠这一经营战略，武航仅以 200 万元启动资金，由一个无飞机、无航线、无运营基地、无办公场所的“四无”公司，完

成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稳步发展，实现了由小机型、短航线到现代化机队、广域航线的飞跃。

武航自诞生之日起，秉持“热心、耐心、诚心、细心”的服务准则，将这份初心融入航班服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搭建起连通旅客、温暖出行的“连心桥”。

1994年4月一天，一架由上海飞武汉的

波音飞机刚刚降落，一辆标有武汉航空公司字样的救护车便疾驰而来，接下一名“特殊旅客”，立即驶往同济医院。这名“特殊旅客”患肝癌急需来汉救治，然而几次购票因需在机上平卧未能如愿。当班机组当机立断，拆除前排左边3个座椅，将担架抬上飞机，并及时通知公司派出救护车接送。

1994年清明前夕，一个售票点电话发生故障，武汉至温州航班多卖出13张票，导致13名旅客无法登机。程耀坤毫不犹豫地决定：专程派一架飞机送13名旅客。一位急于回温州扫墓的旅客感慨万分：“武航真是一心为旅客。”

武航始终坚守诚信底线，宁可自身承担亏损，也绝不辜负一位旅客的托付。1999年5月，在全国首创免费接送旅客服务项目，旅客只需拨打一个电话，专车便免费上门接其到机场，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解除了旅客乘机的诸多不便。此外，推出“送票上门”“上门提货”“无人陪伴儿童乘机”等多项举措，通过服务手段的多元化和服务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乘坐武航专机到武汉访问

质量的特色化，将服务至上的热情，延伸至航线布局与市场经营之中。

为了让干线持续转化为“热线”，1999年抓住昆明世博会的“观赏热”、上海浦东开发的“投资热”及学生“暑假旅游热”，组织航班加班和旅游包机飞行。一年下来，仅昆明、上海、广州、北京、深圳5条“热线”，实现的营业收入就占全年的40%。“热线”航班，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东航武汉公司战略重组继往开来

2000年，武航开通50多条航线，而且绝大多数是国内干线。当年，武航天河机场基地动工竣工，停机坪18个停机位可同时停放18架波音系列飞机。

2001年1月1日，武航整体搬迁至天河机场，结束了租用王家墩机场的历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迅猛扩张。

2002年，民航总局直属的9家航空公司进行联合重组，形成以国航、东航、南航

为主体的三大航空企业集团，深刻影响中国民航业的发展走向。

武航经过 10 多年发展，此时已拥有总资产 30 多亿，航线网络颇具规模。国航、南航、东航在酝酿资产重组中，看中武汉的交通地位，也看好武航的经营实力。

直面行业重组浪潮与未来经营发展，武航与东方航空公司、

上海均瑶集团、武汉高科控股集团实行战略重组，于 2002 年 8 月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航武汉公司），融入全国航空集团体系，完成从独立地方航空公司到大型航空公司核心子公司的战略转型。正如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成立大会上说：“东航武汉公司的成立是民航总局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对民航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的又一成功范例，是我国民航突破所有制单一局限，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的一次新尝试，对提高我国航空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如果说武汉航空公司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跨越，那么东航武汉公司无疑成就了第四次跨越——展翅世界，遨游寰球。2004 年开通大阪、马尼拉两条航线，2006 年完成首尔首飞，2008 年开通台北直航，2010 年开通日本福岡航线，2012 年开通新加坡樟宜、日本静冈两条航线，2013 年开通美国圣弗朗西斯科航线，2017 年开通澳大利亚悉尼直航……



2024 年 6 月，武汉—新加坡航线首飞

至 2025 年，东航武汉公司拥有 36 架波音 737-800 型飞机，构建了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全国并连接国际的航线网络，运营国内外航线 70 余条，通达全球 60 多个城市，航点数量居武汉天河机场各航空公司之首，一跃成为中部地区机队规模最大、湖北地区资产规模最大、利税贡献最大的航空公司，成为助推湖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强劲“航空引擎”。

王钢，武汉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
韩泽宽，武汉图书馆助理馆员

向世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 冯洁菡（口述） 车璇 张梦圆（整理）

人物名片：冯洁菡，民革武汉市委副主委，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讲台：我在武大扎根国际法

我的老师以前常跟我说，作为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讲台站稳。我一直铭记在心。

198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选择了国际法专业，从此与国际法结缘。博士毕业后，因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兴趣而选择留校任教。武大国际法学在国内处于前沿，师资力量和学术氛围都非常好。浸润在这样底蕴深厚的环境中，我可以全身心做研究、带学生。

要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必须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从2007年开始，我就带着学生们参加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这项比赛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旨在推动国际人道法在中国高校的研究和传播。

学生们刚开始参加比赛时，由于缺乏经

验都比较紧张。一次比赛中，一学生因初赛不理想打算退赛，我得知后耐心开导，鼓励他战胜自我、直面挑战。当第二天看到这名学生在赛场上重新找回自信的状态时，我倍感欣慰。

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天职，看到学生们取得进步、战胜困难，收获成绩、不断成长，都是我最高兴的时刻。

2014年至今，我还带着学生们参加每年的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是由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发起，与世界各地的法律组织或大学合作，使用法院的六种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举办的专业性模拟法庭辩论赛，因每年总决赛均由国际刑事法院三位现任大法官出庭审理，成为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之一。

作为主教练，我带领武汉大学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辩论队在比赛中，充分展现了武大学子扎实的国际法功底、专业的法庭辩论能力及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多次在英文赛和中文赛中斩获全国一等奖，并获得前往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我觉得参加比赛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能加深他们对国际法的认识，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有的学生因为参加比赛还转了专业。比如我的一个博士生，她外语水平很好，思辨能力也很强，比赛回来发现了自己的兴趣点，于是从其他法学专业转到国际法。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我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都去国外进修深造或工作过，我自己也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学生们后来都回国了，现在有的在大学当老师，有的在做涉外律师。他们将自己所见所闻所学和工作当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带回国，为我国培训涉外法治人才，争取国际话语权作出了贡献。

研究：我带着中国观点走出去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我作为其中的一员，长期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懈努力着。

世界正在经历新的动荡变革，各种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倡导和践行国际规则，呼吁国际治理法治化，坚定支持联合国各项改革议程，积极促进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积极推动和平与安全、公共卫生、人权、“海天空网”、多边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国际治理，为国际司法实践活动提供支持。

从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起，我就持续关



2021年6月，冯洁菡（左五）和她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合影留念

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药品的可及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问题。2020年，武大国际法治研究院组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中国贡献”核心团队，由我担任首席专家。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以及相关委托的修订与完善国际卫生规则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被相关部门认定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学生们评价我，是“闷声干大事”的人。

2023年9月20日和21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分别举行“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和“全民健康覆盖”两场关于全球健康的高级别会议。作为当时国内唯一向联大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学术机构代表，我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达成了诸多共识。作为中国学术机构和多利益攸关方积极与会，这是我们国际法治研究院围绕提升中国对外话语创新与传播能力的战略需求，是致力于提升中国国际法学术交流国际可见度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围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知识产权保护、巴以冲突、海洋法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交研究报告40余篇获国

家相关部门采纳，其中9篇获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8篇立法建议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办公室采用，1篇获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优秀研究成果特等奖，2024年荣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排名第二）。

2024年2月，我与中国代表团和其他高校专家赴荷兰海牙参加国际法院巴以问题咨询意见案口头程序。这是中国第二次参加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案的庭审，受到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在此前的准备工作中，我参加了中国书面意见的论证，一些意见获得积极采纳。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层特别显眼——整齐地按年份排列着同一系列书籍《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我长期系统总结中国促进国际法治理论、实践与成就，与肖永平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中英文十余部。该报告自2020年以来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获知名法学数据库HeinOnline“中国法律与社会数据库”收录。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阐明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积极应对国际变革，为促进国际法治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发声：我为民生奔走

2005年，我加入民革。20年来，我对民革组织的感情愈加深厚，对民革优良传统的体会也愈加深刻。

作为民革党员和湖北省政协委员，我真履职尽责，积极服务地方发展，热心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任民革武汉市硚口区工委主委时，为破解老旧小区垃圾分类难题，推进

老旧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我率工委部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骨干赴上海徐汇区、长宁区等地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进行实地调研。

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作为一个动迁安置小区，通过“绿主妇”开展社区自治活动，由曾经远近闻名的“垃圾三村”转变为如今的“花园小区”。上航新村从2017年10月通过启动绿色账户，很快取得明显效果。这些成功经验为我们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拓展了思路。回到武汉后，我又结合调研成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为推动城市垃圾分类工作贡献民革力量。

担任民革武汉市委会副主委后，我分管参政议政工作。近年来，我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20余篇，1份提案被评为湖北省政协优秀提案，我本人多次被评为参政议政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收获“武汉市巾帼英雄”“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武汉统一战线优秀参政建言成果奖”等众多荣誉。

此外，我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联合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组织民革党员和武汉大学学生志愿者一起开展法治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活动，为未成年人、社区群众、残障人士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普法教育。民革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在学校和学术之外，与社会有了很多接触，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对于我指导学生也更有帮助。

培养人，是一生的事。在退休之前，我想花更多的时间专注在好好培养学生上，特别是带本科生，尽我所能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国际法专业人才。

翠染长江岸 蔬兴十亿业

——嘉鱼潘家湾蔬菜产业发展蝶变史

◇ 殷铁山

长江之滨，江汉平原南缘，嘉鱼县潘家湾镇坐落于北纬 30 度的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是《诗经》中“南有嘉鱼，烝然罩罩”的诗意栖居地，是长江冲积平原馈赠的沃土良田，更是一片因蔬菜而改写命运、因产业蝶变而绽放荣光的希望之地。

2024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脚踏青翠田垄，与菜农并肩交谈，询问蔬菜品种、种植技术、市场销售与增收情况，殷殷嘱托道：“要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把富民产业做好，让群众增收致富。”这份嘱托如灯塔引路，照亮了潘家湾蔬菜产业的前行方向。

七户农民与一包蔬菜种子

潘家湾是嘉鱼县的农业重镇，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长江冲积形成的潮土，土层深厚，透气性好，富含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为蔬菜生长提供了绝佳的土壤条件。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了充足的光照和降水，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年均气温 16.8℃，年均降水量 1300mm，既适合甘蓝、白菜等耐寒蔬菜生长，也能满足冬瓜、南瓜等喜温蔬菜的需求，是天然的蔬菜种植天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片沃土上的



习近平总书记 在嘉鱼县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

百姓却始终摆脱不了靠天吃饭、增收艰难的困境。彼时，潘家湾镇的农业生产以粮棉油为主，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劳作，春种秋收，忙忙碌碌一年，除去成本，所剩无几。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潘家湾镇肖家洲村的江堤边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杂草丛生、土地贫瘠，平日里只有牛羊在滩上觅食。最早点燃这片荒滩希望的，是田尚新等七户农民。

1981 年春天，27 岁的田尚新怀揣着一本磨破皮的科技杂志，辗转千里来到山东福山。杂志上介绍的“福山包”大白菜亩产高、品质好、收益高，深深吸引着他。从山东带回第一包“福山包”大白菜种子，田尚新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他召集了村里田实华、田道华、田新华等六户乡亲，说出了在江滩试种蔬菜的想法。“当时大家都很犹豫，怕种不好亏本，毕竟那时候家里都不富裕，输不起。”田实华回忆道，“但尚新说，与其守着荒滩穷一辈子，不如大胆试一次，就算亏了，也比不试强。”

就这样，七户农民凑了一笔钱，买了

种子和肥料，开始在江滩边开荒。没有农具，就自己动手制作；没有水源，就肩挑背扛从长江取水；没有技术，就对着科技杂志一点点摸索，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种植技术。江滩上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他们一株株拔掉；泥土坚硬，就一锄头一锄头刨开，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血泡，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对这七户农民而言，那是一段艰辛却充满希望的日子。他们春天播下种子，每天都要去田里查看出苗情况，生怕遇到病虫害；夏天顶着酷暑浇水、施肥、除草，汗水浸湿了衣衫，晒黑了皮肤；秋天盼着丰收，时时去田里观察蔬菜长势，心里既期待又紧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当年秋天，他们试种的大白菜获得了丰收。饱满的白菜鲜嫩多汁，亩产达到五千多斤，按当时的市场价，一亩地收益超过一千元，是种植水稻的五倍之多。“当我们把白菜收回来，卖到镇上的集市，拿到钱的那一刻，大家都激动地哭了。”田尚新说，“我们终于成功了，终于找到了一条致富路！”

七户农民试种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潘家湾镇。村民们纷纷来到肖家洲村，看着田埂上饱满的大白菜和七户农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心里羡慕的同时也又动了念头。村民们纷纷表示：看到尚新他们种蔬菜赚了钱，也想试试，就算不能赚那么多，也比种粮强。

面对村民的渴望，田尚新等七户农民

没有藏私，他们把自己的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乡亲们，带着大家一起开荒、播种、管理。1989年，邻村三湾的一个无房户，从田尚新处买了5亩地的蔬菜种子，当年就赚了9000元，年底建起3间漂亮的新房。这个真实的案例，进一步点燃了全镇农民种蔬菜的热情。

从那以后，潘家湾镇的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从最初的几亩荒滩，发展到几十亩、几百亩。田尚新等七户农民就像七颗火种，点燃了潘家湾人致富的梦想，也点燃了潘家湾蔬菜产业的希望，他们的勇敢尝试，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改写了潘家湾镇的历史，为后来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当年的七户农民有的已经年迈，有的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但他们的故事永远被潘家湾人铭记。那第一粒种子，那一片荒滩，那一份执着，早已成为潘家湾蔬菜产业发展史上最珍贵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潘家湾人在致富路上勇敢前行。

建成十里蔬菜长廊

七户农民的成功试种，如星火燎原，迅速点燃了潘家湾镇农民种植蔬菜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放下手中的粮棉油作物，投身到蔬菜种植中来。但此时的蔬菜种植，依然是零星散种、各自为营，种植面积小、品种单一、技术落后、销售困难，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据潘家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刘朝辉回忆，那时大家各干各的，你种白



嘉鱼县潘家湾镇肖家洲村村民叶祥松（左）、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军（中）、潘家湾镇农业技术人员刘朝辉（右）合影

菜，我种甘蓝，既无统一规划，也缺技术指导，种出来的蔬菜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更棘手的是，由于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菜农只能拉着蔬菜去镇上集市碰运气，遇到行情不好，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面对困境，潘家湾镇党委、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认识到，要让蔬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必须改变“零星散种、各自为营”的模式，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之路。于是，镇党委、政府主动作为，牵头整合土地资源，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组建蔬菜专业合作社，推动蔬菜种植从“分散经营”向“抱团发展”转变。

2012年起，咸宁市、嘉鱼县政府每年安排近千万元专项资金，大力推动潘家湾镇蔬菜标准园创建，建设“千亩成块、万亩连片”的优质蔬菜基地。镇党委、政府组织干部深入各村组，宣传土地流转政策，耐心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修建灌溉水渠、硬化田间道路，改善蔬菜种植条件，为蔬菜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保障。



嘉鱼县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

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农民纷纷加入蔬菜专业合作社，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加入合作社后，我们不用自己操心种子、肥料，也不用自己跑销售，合作社都会安排好，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在田里劳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肖家洲村村民叶祥松回忆说，“合作社还会请专家来指导我们种植技术，让我们种的蔬菜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潘家湾镇的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几百亩，发展到几千亩、上万亩。一条条田埂被打通，一片片零散的菜地被整合，形成一望无际的蔬菜种植基地。2015年，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正式建成，长廊西起肖家洲村，东至四邑村，全长10公里，核心区面积达2.7万亩，涵盖甘蓝、白菜、冬瓜、南瓜等多个品种，成为湖北省规模最大的连片蔬菜种植基地之一。

如今，走进十里蔬菜长廊，仿佛走进一片绿色的海洋。一望无际的甘蓝、白菜、冬瓜，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田间地头，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清晨的长廊更是热闹

非凡：菜农们背着竹筐在菜畦间采摘蔬菜，蔬菜经纪人穿梭在田间忙着收购，大型货车在硬化的田间道路上往来穿梭，将新鲜的蔬菜运往全国各地。

在潘家湾镇蔬菜交易市场，每天清晨四五点就己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早早赶来挑选新鲜

蔬菜。在他们看来，潘家湾的蔬菜品质好、新鲜，深受消费者喜欢，每天收购后运往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供不应求。

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产量和产值的稳步攀升。截至2024年，潘家湾镇蔬菜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年产量超过21万吨，年产值突破1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乡镇”。从零星散种到十里长廊，从各自为营到抱团发展，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书写了规模化发展的精彩篇章。

“思特丹”实现自主育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子问题，反复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对于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来说，科技就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蝶变的核心力量。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从依赖进口种子到自主育种，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在科技的赋能下实现了质的飞跃。

产业发展初期，种子问题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那时，村民种植

的甘蓝、白菜，种子都是从日本、荷兰进口，一袋甘蓝种子要 140 多元，价格昂贵不说，还常常只按 70% 供种，一旦国外公司不供种，就会面临无菜可种的情况。而且，进口种子适应性较差，在潘家湾的气候条件下，产量和品质都不稳定，给菜农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没有自主可控的种子，蔬菜产业就没有主动权。为了解决种子“卡脖子”问题，2007 年，金润农业携手“中国甘蓝之父”方智远院士团队，开展越冬甘蓝国外替代品种选育。院士团队扎根潘家湾的田间地头，深入了解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结合市场需求，开展品种选育试验。

选育过程充满了艰辛。科研人员每天都要在田间观察蔬菜的长势，记录株高、叶形、抗病性等数据，反复进行试验、筛选。遇到病虫害、极端天气等问题，他们还要及时调整选育方案，加班加点攻克技术难题，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天黑了才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一句怨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11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 2018 年，集合了耐寒、球色绿、耐裂等优异性状的越冬甘蓝自研新品种“思特丹”问世。2019 年 3 月，“思特丹”首

次采收，潘家湾种植户亩收入超万元，比种植进口品种增收 20% 以上。而“思特丹”的种子价格只有进口种子的三分之一，大大降低了菜农的种植成本。

如今，“思特丹”已成为潘家湾镇甘蓝种植的主导品种，占全县越冬甘蓝种子份额七成以上，更成为整个长江流域越冬茬口的主栽品种，推广面积超一百万亩，年创收近 50 亿元。金润农业科技园里，每年有 2000 多个新品种持续试种，“绿玉”“392”等新一代品种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应对市场变化。

除了自主育种，潘家湾镇还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建设，让科技渗透到蔬菜种植的每一个环节。在金润农业集约化育苗基地，3 栋联栋大棚、40 个单体大棚整齐排列，物联网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补光设备模拟最佳生长环境，每年繁育蔬菜种苗约 16 亿株，让周边 8000 农户的 3 万亩菜地彻底告别靠天吃饭。

嘉鱼县富德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国雄对此感触颇深，过去育苗全靠经验，温湿度控制不好，幼苗成活率低；如今有了物联网系统，温湿度、光照都能精准控制，幼苗成活率达到 95% 以上，苗齐苗壮，再也不怕倒春寒了。该合作社年供苗 3.2 万亩，为周边菜农提供了优质种苗保障。

在种植环节，潘家湾镇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前沿适用技术。水肥一体化设备能够根据蔬菜的生长需求，精准供给水分和肥料，既节省了水资源和肥料，又提高了蔬菜的产量和品质；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



嘉鱼县金润农业集约化育苗基地

方式，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蔬菜质量安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土壤的肥力情况，科学搭配肥料，实现“缺什么补什么”，让土壤保持肥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技的赋能，不仅改变了蔬菜种植模式，更培育出了一批新时代的“新农人”。2024年6月，农业科技“天团”——长江流域越冬甘蓝研发中心、湖北洪山实验室嘉鱼基地等6家涉农科研与服务机构落户潘家湾，共同组建嘉鱼县蔬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多个博士团队入驻，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矫振彪博士正在蔬菜科技馆开展科研。在他看来，过去育种筛选要跨省跑，如今在本地就能实时观察幼苗长势、调整培育参数，省时省力。他的团队正重点推进甘蓝数字化健康栽培技术模式落地，让长江流域越冬甘蓝种植的品质提升、风险降低，让农户的收益更有保障。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育种，从靠天吃饭到科技赋能，潘家湾镇的一颗甘蓝，实现了现代化蝶变。科技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潘家湾蔬菜产业不断升级，让嘉鱼蔬菜的品质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

嘉鱼蔬菜天下知

“好酒也怕巷子深。”有了优质的蔬菜产品，还要有响亮的品牌，才能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实现价值最大化。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在实现规模化、科技化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从无名无姓的“嘉鱼菜”，成长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知名品牌。

在潘家湾镇蔬菜产业发展的初期，蔬

菜销售主要以“原菜”为主，没有品牌，没有包装，只能论斤卖给经销商，价格低廉、附加值不高。虽然蔬菜品质很好，但因为没有品牌，只能卖低价。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潘家湾镇党委、政府牵头，大力推进品牌创建工作，打造“嘉鱼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特色企业品牌，形成“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的品牌矩阵。2017年，“嘉鱼甘蓝”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潘家湾镇蔬菜产业的第一张“金字招牌”。2023年11月，嘉鱼县被授予“中国甘蓝之乡”称号，进一步提升了“嘉鱼蔬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5年10月，“嘉鱼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其标识设计灵感源自《诗经·小雅》中的“南有嘉鱼”，巧妙融合嘉鱼地标“双鱼戏珠”雕塑意象与新鲜蔬菜元素，整体造型清新灵动，色调明快柔和，传递出“绿色、健康、安全、共享”的品牌理念。品牌发布后，嘉鱼县同步建立认证体系和使用规范，首批9家企业获颁“嘉鱼蔬菜”品牌使用授权，涵盖甘蓝、白菜、莲藕、辣椒等多个主导品类。

品牌创建，品质是根基。潘家湾镇始终坚持“质量之路”，严格推进标准化生产，严把产地环境安全、生产过程安全、产品质量安全三道关。截至目前，全县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普及率超过90%，已建立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20万亩，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60%，各类蔬菜在每年的1600多批次抽检中，合格率均达100%。

如今，潘家湾镇已有8个蔬菜品牌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成功注册“联乐”“潘湾金润”“潘湾鑫农”“长江滩”等近百件蔬菜类商标，形成了强大的品牌矩

阵。品牌的力量,让潘家湾的蔬菜摆脱了“论斤卖”的困境,实现了“论质卖”“论价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品牌崛起,市场拓展是关键。潘家湾镇培育了1000余名蔬菜经纪人,纵横大江南北,在全国600多个农贸市场建立了销售网络,让“嘉鱼蔬菜”走进了千家万户。设在肖家洲村、潘家湾村、四邑村等8个蔬菜交易市场,每天都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络绎不绝。

郑胜维就是千名蔬菜经纪人中的佼佼者。这位1989年出生的“农二代”,既有父辈扎根土地的韧性,更有新农人开阔的视野。2009年,正在青岛理工大学上学的郑胜维,一边上学一边代理家里蔬菜出口日韩的业务,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外贸客群。2018年,他成立嘉红蔬菜专业合作社,当上全职蔬菜经纪人,一手打入三全、思念等上市食品公司的馅料供应链,一手把嘉鱼产鲜菜经由青岛转口到日韩和东南亚,还保证每天向自家设在广州和佛山农贸市场的档口供货200吨。

除了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潘家湾镇还积极拓展电商渠道,与叮咚买菜、盒马鲜生、天猫优品等大型供应链平台建立直采合作,实现“从基地直达餐桌”的品牌渠道闭环。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分拣车间内,数十名工人正将嘉鱼甘蓝与大葱组合打包,每天至少10吨货量的包裹,通过网购平台直达消费者餐桌。

鲜菜俏销的同时,潘家湾镇还积极推进蔬菜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发展蔬菜深加工产业,让“嘉鱼蔬菜”实现从“鲜菜”向“附加值产品”的跨越。近两年,嘉丽蔬菜、佳和果蔬、雪萝泡菜等3家蔬菜加工企业相继落地,其中嘉丽生态公司的脱水蔬菜

加工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3条脱水蔬菜加工生产线,主要生产脱水甘蓝、白菜和萝卜,25斤鲜菜最终加工成1斤脱水蔬菜,附加值提升20%以上,预计年深加工蔬菜能力达5万吨,年产值突破1亿元。

如今,嘉鱼蔬菜已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北有寿光,南有嘉鱼”的行业地位日益凸显。

田野上的回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萦绕在潘家湾人的耳畔,指引着潘家湾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如今,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不仅实现了十亿级的产业蝶变,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富民产业,让总书记的嘱托在这片田野上成为现实。

蔬菜产业的发展,让潘家湾镇的农民实现了“一户多收”,腰包越来越鼓。当地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创新推出“租金+薪金+股金”三金模式,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租金”,即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或企业,每年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薪金”,即农民在合作社或企业务工,获得工资收入;“股金”,即农民以土地经营权、资金等入股,参与合作社或企业分红。

其中,村民叶祥松就是“三金”模式的受益者。他将家里的5亩地流转给合作社,每年能拿到5000元的租金;平日里在合作社的菜地务工,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到了年底,还能从合作社领到一笔分红。一年下来,他的总收入能达到5万多元。叶祥松笑着说,以前种水稻,辛辛苦苦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考察时，同村民们亲切交流

也只能挣一两万元，如今种蔬菜，收入翻了好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统计，2025年嘉鱼县蔬菜产业年产值预计达60亿元，带动全县7.5万名农民参与经营、务工，农民人均年创收1.7万元，同比增长6.1%。其中，潘家湾镇作为核心产区，蔬菜产业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年创收超过2万元，越来越多的农民，靠着种植蔬菜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路。

产业兴，则乡村兴。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农民增收致富，更让潘家湾镇的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土坯房，变成了整齐漂亮的楼房；曾经泥泞的田间道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曾经的荒滩，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蔬菜长廊。村里相继建起了养老服务驿站、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让村民们养老有保障、看病有地方、办事更方便。

在潘家湾镇四邑村，还设立了养老服务驿站，老人们每天都能在这里免费就餐、休闲娱乐，享受贴心的服务。乡村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更体现在村民精神面貌的改变上。如今的潘家湾人，

不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他们有了自己的产业，有了稳定的收入，脸上洋溢着自信、幸福的笑容。农闲时节，村民们会参加村里组织的文化活动、技术培训，学习种植技术、电商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翠染长江岸，蔬兴十亿业。从40多年前七

户农民的勇敢试种，到如今十亿级产业的蓬勃发展；从依赖进口种子到自主育种，从零星散种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从农民增收困难到实现共同富裕，潘家湾镇的蔬菜产业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蝶变史诗。

这片土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承载着潘家湾人的致富梦想。未来，潘家湾人将继续坚守初心，让“嘉鱼蔬菜”的品牌更响亮，让农民的日子更红火，在长江之畔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田野答卷。

（本文根据郑胜维、叶祥松、田尚新、刘志雄等人讲述，并参考了汪俊东、方泽文、皮博、张进、赵莎莎、魏隼、谢燕子、邓丹、龙钰、卢建、雷平等多位同志相关著述材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殷铁山，嘉鱼县高铁岭人，湖北省作协会员，咸宁市小说协会副会长

金融变局中前行，政协履职里领悟

◇ 车泽鹏（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车泽鹏，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这些年常有人问我，这一路走来靠的是什么？我想，一是愿意付出，二是主动学习，三是乐于反思。上学时当班长，养成了奉献精神；去泰国留学，打开的是国际视野；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锻炼的是专业能力；在政协履职，提升的是思想格局。这四样东西，撑起了我十余年的职业发展，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两大项目开启金融新程

我是山西吕梁孝义人。孝义是山西省唯一连续 19 年跻身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的

县级市，煤焦铝等传统产业发达。2007 年高中毕业，我选择了一条不太寻常的路，去泰国易三仓大学留学。

易三仓大学作为泰国顶尖私立名校，采用全英文教学且秉持宽进严出的培养模式。初入学时，因英语基础薄弱我屡遇挑战，甚至萌生过辍学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顺利完成四年本科学业。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坚持的力量，也在攻克难关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与学历的双重硕果。

本科毕业后，我返乡帮父亲养了八个月的猪，亲身体会到畜牧养殖的艰辛、父亲的不易，也认清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坚定了通过深造赴大城市发展的想法，于是重回母校攻读 MBA。

硕士毕业后，我与同为校友的妻子一同规划未来。她是湖北襄阳独生女，不愿远赴山西，而我家中有姐姐照料父母，暂无后顾



车泽鹏在易三仓大学留学

之忧，最终我们折中选择扎根武汉，兼顾事业发展与家人陪伴。

2014年，我揣着研究生文凭来到这座城市开始找工作，没想到求职的艰难超出了预期，在网上投递简历，收到的回复大多是保险销售类岗位。我索性关了电脑，打印了一摞简历，在汉街附近的写字楼逐家敲门应聘。靠着这份勇气，十几天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入了国融汇通资本，这是一家券商旗下的创投子公司。

刚入行时，我对金融几乎是一无所知。记得有次领导让我查询某只股票的质押到期日，问我怎么查，我说不知道。他说按F10，我竟不知道F10是何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从零开始。

但幸运的是，我很快参与了两个有分量的项目：一个是作为财务顾问参与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的并购项目，交易规模超过60亿元，最终为恒大提供了并购融资服务；另一个是为荆门市搭建规模10亿元的产业引导母基金。这两个项目让我对金融行业有了初步认识，金融不只是开设账户、销售产品，培养了做大业务的格局。我边干边学，查阅

资料、请教前辈，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周围的水分。

2016年，我加入华融证券。当时业务上尚不熟练，但我始终相信，做金融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在华融期间，我坚持定期拜访各家农商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经过持续沟通，黄石农商行对我们团队的专业能力给予认可，委托了1.8亿元资金。以此为起点，我们又陆续与其他农商行展开合作，2017年全年，协助团队完成的资管产品委外销售规模达到27亿元。

那几年是资管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风险逐步积聚的阶段。2018年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许多机构面临调整。我一边处理存续产品的相关工作，确保平稳过渡，一边继续深耕业务。也正是在这一年，我走上营业部管理岗位，开始承担更多责任。

回想起来，这段金融入门之路走得跌跌撞撞，我的成长有运气的成分，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愿意付出。从小担任班长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你愿意为别人付出，别人才会愿意信任你、帮助你。

低谷中闯出一片天地

2019年5月，我调任国都证券武汉营业部总经理。接手时，营业部正处在低谷。武汉营业部成立于2004年，下辖襄阳、荆门两家轻型营业部，但在全公司60家分支机构中长期排名靠后。初来乍到，我对零售业务也不熟悉，但心里清楚要改变现状光靠等是不行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只能居家隔离。那是武汉最艰难的时

刻，也是我最焦虑的时刻。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业务不知道还能不能做，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一次机会。人们居家办公，线上交易活跃，正是盘活存量客户的好时机。那一年，我带领团队坚持每日晨会、夕会，细化过程管理，做实客户服务。年底统计，我们营业部的综合考评在全公司排名第一，这是营业部成立16年来的最好成绩。总部领导得知后，特意表示：武汉如此艰难，你们能逆势突围，实属不易。

此后三年，我带领营业部始终稳列公司综合考评前三。2023年末，国都证券被浙商证券并购的消息传来，我第一时间意识到，这并非发展的挑战，而是跻身头部券商、实现更大发展的重要机遇。虽身处被并购方，我仍带领团队凝心聚力、稳扎稳打，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干事状态，在新的发展平台上扎实做好各项业务。凭借团队的共同努力，2024年到2025年营业部连续两年拿下全国分支机构综合考核第一名的成绩，在行业整合的变局中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新突破。

取得这些成绩，并非有什么秘诀，而是把基础工作做实做细。我们建立了营业部的微信公众号，坚持每日更新，既做投资者教育，也借此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我们拓展了银行渠道合作，增加了新增客户的来源；对客户进行分层分类管理，用投顾服务带动营销；优化了考核方案，让激励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在管理上，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平衡好股东利益、员工利益、客户利益是我的管理理念。刚到营业部，我就鲜明地提出“只有国都好，大家才会好”，把自己姿态放低，把员工放在前面。我常对团队说：你们要告诉我需要做什么，因为具体工作都是你们在

做。只有让员工感到被尊重、被信任，团队才有凝聚力。

行业在变、平台在变，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如对业务的理解、对客户的诚意、对团队的信任，这些沉甸甸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资本。

履职中转变思想

2021年底，我成为汉南区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委员。政协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结识许多阅历丰富、见识广博的前辈，与他们交流，自己的眼界和格局也随之提升。听他们聊城市发展、聊民生关切，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人生之书。

坦率地说，在刚担任政协委员的前两年，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身份的意义，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有所领悟。

转变的契机，源于我开始认真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我静下心来逐字逐句地读，突然发现每一句话都有分量，每一个数字都有依据。这些并不是空洞的文字，而是一个城市未来一年的路线图，是切切实实的民生关怀。

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研究四级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的、省里的、市里的、区里的，就像研究上市公司的年报一样。去一个区谈业务前，我都会先把这个区的工作报告研读一遍，见面时偶尔提及报告中的内容，对方往往会觉得你做了功课、是真的关心他们的发展，交流也会顺利得多。

在这个平台上我开始认真履行委员职责。2023年，我专程赴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合肥高新区考察调研。在合肥，我参观了科大讯飞、科大硅谷、蔚来汽车、国仪量子等企业和机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工

作机制：工作专班只标明职务，不写具体姓名，市长担任组长就是市长负责，不论人事如何变动，机制保持不变。

调研过程让我深有感触，回到武汉后提出建议：武汉产业升级应当提高规划层级，加强省级统筹，推动“武襄十随”协同发展，深化“车谷”与“光谷”的产业联动，并创新工作机制。这些建议后来被吸纳进“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的相关规划中。

在政协履职中，我特别关注残疾人事业。经开区龙湖社区有一个“阳光家园”，服务着190多位残疾人朋友，但活动场地一直紧张。我联系街道社区和残疾人代表，与有关部门协商，在上级残联支持下，利用社区架空层改造了新的活动场地。

2024年7月，我带领员工和社工前往慰问，送去生活物资，与他们围坐交流。一位残疾人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能来，我们就觉得还有人记得我们。”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政协委员的职责，不只是参加会议、提交提案，更重要的是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2024年12月，我当选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个协会原有会员单位170家，成员主要是央企、省属国企、上市公司和地方平台的总会计师。接手后，我对会员结构进行了梳理，分为四类：央企国企总会计师、上市公司财务总监、会计领军人才、高校会计教授。目前会员规模已接近200家。未来几年，我计划将会计师协会规模扩大到500家会员，整合更多资源服务行业发展。



参加政协武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投入这么多精力做协会工作，是因为我看到了它背后的意义。会员单位的总会计师们，是各自企业财务管理的掌舵人，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把他们聚在一起，交流经验、碰撞思想，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回顾这几年的履职经历，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领悟”。领悟了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领悟了调查研究的意义，领悟了为谁履职、为什么履职的真谛。去年我被评为履职优秀市政协委员，内心有些惭愧，毕竟前两年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但领悟了就好，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我始终认为，做任何事都要有高度。站在资本市场的视角看问题，就不会局限于一家营业部的得失；站在城市发展的大局看问题，就不会觉得调研是额外负担。思想有高度，做事才有力度。

钢骨闯商海，瓷心暖江城

◇ 于桂英

人物名片：于桂英，湖北省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湖北景盛炜烨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博盛陶瓷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陶瓷非遗传承人。先后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湖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我是一个从景德镇陶瓷世家走出来，在武汉的钢铁江湖摸爬滚打 20 余载，又转身扛起陶瓷文化传承大旗的创业者。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我在商海打拼了半个世纪，如今依旧站在企业一线，只因心里始终揣着一份坚韧，一份对事业的执着，还有一份对这座城市、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平米出租屋，从零闯钢市

我的人生轨迹，似乎从出生起就被刻下了两种印记——陶瓷的温润和钢铁的坚毅。我出生在 50 年代的江西景德镇，深受陶瓷文化的熏陶。父母给我取名“桂英”，盼我如巾帼英雄穆桂英一般坚毅勇敢。小时候看别人捏泥、绘瓷、烧窑，陶瓷的美早已入眼入脑入骨；但命运却让我先与钢铁结缘，在硬邦邦的钢材贸易里，磨出了一股不服输的性子。

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景德镇市招商局经济开发公司任副总经理、景德镇市外贸局



于桂英（中）在钢厂考察产品质量、生产进度和产能情况

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任总经理。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日子安稳顺遂。在国企的锻造下，我还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但世纪之交的国企改革，像一场时代的浪潮，推动着每个人做出选择。我所在的国企也不例外，改制是企业的必答题，而我也因此必须回答自己命运的选择题：是守着舒适区，还是闯一闯未知天地？我骨子里的韧劲冒了出来——为了支持改制，也为了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挑战，2000年，我辞掉领导岗位，只身一人离开故土，来到武汉。

初到武汉，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举目无亲，白手起家”。我租下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那就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家”。没有人脉，只能一家家拜访潜在客户，但一次次被拒之门外。印象最深的是，为了见一家大型钢厂的销售领导，在他们单位门口守了三天。第一天被保安拦下，第二天只见到秘书，直到第三天，才在停车场等到刚上班的负责人，递上连夜整理的行业分析报告。他看着我说：“就冲你这股执着劲，我给你一次机会。”就是这一次机会，让我敲开了武汉钢铁行业的大门，也让我坚信，

只要肯坚持，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创业初期，公司规模小，常被客户质疑实力，但我不气馁，在夹缝中求突破。有一次，一家汽车制造厂需要一批紧急钢材，多家供应商因怕风险不敢接单，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着头皮把烫手的订单接下来。为保证质量，我去钢厂跟单，

盯生产、催进度，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最终准时将合格钢材送到客户手中。

结账时，客户主动提出加付“加急费”，我婉拒了，“合同上没有注明的收费，我们一分不要”。这次合作后，这家汽车制造厂成了我的长期客户，其后还为我介绍了多家合作伙伴。至2005年，我的公司在武汉站稳了脚跟，还成功将钢材出口海外，成为业界首家从事钢铁国际贸易的民营企业。

6天5000公里，钢材“铁”得很

做钢铁贸易的这些年，我见过太多风浪：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金融风暴、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每一次，都有人倒下，但我们总能扛过来，只因我坚信，企业家精神，从不是顺境中的高歌猛进，而是逆境中的咬牙坚持，是急人之所急的担当，是守得住信誉的本心。

2008年雪灾，我接到江苏无锡一家企业的电话，急需购进4万吨钢材，企业完成不了合同要被罚款，请求我想办法支持解决。“急合作单位之所急，解合作单位之所

难”是我一贯的理念，我随即带上有关资料，冒着冰雪路滑的危险驱车赶到南昌，组织货源。那时火车停开，飞机待飞。我焦急万分，凌晨在机场待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搭乘货运飞机赶到无锡。对方领导看到我不顾危险为企业解困，感动不已。

一次我陪同客户考察，不慎跌倒扭伤了腰，硬是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直到当天的工作结束后才去医院，此时已是受伤后的5个多小时。拍片后医生惊叹不已，要求立刻做微创手术，但我想到明天还有事，不能耽误工作，便说“今天不做”。医生很不理解，也颇有些生气，要我对自己的治疗意见签字负责。

2021年夏天，为掌握客户的材料使用情况，我从湖北出发，跑江西、闯山东、上北京、赴陕西，6天奔波5000公里。2023年，我与一个供应单位签订了20万吨的钢铁协议，由于经济低迷，原材料矿石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低，导致协议供货方不能执行，有退货款的可能。如果协议不执行，影响的不单是一个业务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信誉问题。我用两个多月时间，往返在供货单位及客户之间，穿梭协调。企业的生产计划受阻，我主动想办法，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协议执行到位，各方都很满意。

这些年我所经手的钢材上百万吨，无一例经济纠纷发生。客户说我销售的钢材“铁”得很，“用于桂英订的材料，是最可放心的”，“讲信誉、保质量、保数量、保时间”是合作方对我的高度认可。

跟踪试模13年，熬出一片新天地

“与大型国企合作，做高端项目”，我时时瞄准国家高科技企业的动态发力。我了

解到一家全球最大压缩机研发制造企业正在搞试模研发，就主动投资参与进去，可这一跟踪试模就是13年，我的公司也就成了这家企业可靠的合作伙伴。还有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要做汽车钢试模，我们主动跟踪、参与试模，一干又是8年，业务自然又攀上了这门新“亲”。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钢铁市场进入下行期，我又一次发挥“逆周期布局”的思维。当同行都在缩减研发投入时，我敏锐地意识到高端钢材是未来趋势，主动联合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加大对新能源汽车钢、高牌号电工钢的试模研发力度。2023年，公司研发的新型新能源汽车钢通过客户测试，订单量同比增长50%，成功实现“逆势翻盘”。

如今，公司已与多家中国500强企业、世界500强企业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双轮驱动。这让我明白，做企业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看得远、走得新，要紧跟时代步伐，瞄准行业前沿，敢于创新，敢于投入，哪怕眼前煎熬，熬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

40天“海上惊魂”，国际贸易稳中求进

做国际贸易，从不是一帆风顺，风浪与挑战常伴左右，而每一次考验，都是对初心和担当的淬炼。2022年的一次“海上惊魂”，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恰逢俄乌冲突，海域局势紧张，公司一批进口的钢材货船在海上滞留了10天，客户那边催单电话不断，公司内部也有人建议“弃货止损”。我平复心情后一边安抚客户，“只要船还在，我们就一定负责到底”；一边联系国际航运公司，多方协调航线。

海船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跟踪，关闭了

船上的GPS。我揪着心，每天守在电脑前搜索，密切关注船只的消息。最终，货船绕行其他海域，历经40天终于安全抵达我国的港口。当客户收到货物后，特意发来邮件：“诚信企业的担当让我们折服。”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注重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随后牵头建立了“多航线备选机制”，为国际业务加上了“双保险”。

为开拓俄罗斯市场，2025年我带队前往俄罗斯拜访某钢铁集团。由于通信不畅，发邮件、电话预约，总是联系不上，但我不愿意放弃任何潜在机会。到达该集团后，门卫拦住不让进，我就在大门口，把保卫部门张贴的电话让翻译挨个拨打，说明来意。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口部部长同意下楼见面。临时见面没有会议室，几人就站在办公大楼走道交谈。当我拿出随身携带的钢材样品和合作方案，详细解读产品的技术参数和定制化服务时，部长频频点头，“你的专业和坚持，让我看到了合作的诚意”。这次简单的“走道会谈”，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合作意向，为公司开辟俄罗斯进出口业务奠定了基础。

投资千万余，传播瓷文化

钢铁事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后，我心里的陶瓷情结，开始慢慢发芽。陶瓷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根，总想着把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带到武汉，让这门国粹在江城绽放光彩。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但我深知，创业不是单一的前行，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循着心底的热爱，拓展人生的宽度。2015年，我在武



钻研瓷上绘画

汉创办博盛陶瓷艺术馆，搭建国学传统文化及陶瓷艺术公益培训基地，“钢铁女侠”与“陶瓷文化大使”的身份在我身上完美融合。

为让陶瓷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在景德镇打造集陶瓷研学、国学体验、民宿文旅于一体的基地，在武汉与江西陶瓷工艺美术学院、江汉大学开展校企合作，培养陶瓷专业人才；邀请景德镇陶瓷大师来汉举办公益讲座，组织街道干部、学校师生参观体验，疫情期间还开通斗鱼直播，带网友“云游”艺术馆，讲解陶瓷制作工艺。2018年至2023年，我开展数百场陶瓷文化公益活动，投入超千万元。有人问我图什么，我说，陶瓷从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品，它该成为连接城市、传递文化的桥梁。

为更好地传承陶瓷技艺，我重拾陶瓷学习，钻研瓷上绘画、陶瓷设计，考取国家一级陶瓷技师（高级），成为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21年，哥伦比亚前总统访问武汉时，特意到艺术馆参观，看到我参与设计的“汉瓷融合”系列作品，称赞“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是女性创业者的智慧”。那一刻，我深知所有付出都有回报，

也更加坚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心里有光，循着热爱去做，哪怕跨界，也能开出别样的花。

捐款 400 余万，回馈社会

企业做大了，就不只是老板的企业，更是社会的企业，做企业的终极意义，就是为员工创造幸福，为社会贡献力量。

二十余年来，我待员工如家人：疫情封城，我把孤身一人、从小缺失母爱的年轻员工接到家中过年，吃住数月，像母亲一样关怀陪伴；员工妻子患重症，我特批他居家办公，工资照常发放，离职后仍每月自掏腰包给予经济帮助；女员工产假结束后离家远、孩子尚小，我为她延长假期，全额缴纳社保，减轻她的经济负担。2020 年疫情最严重时，钢铁市场遇冷，很多同行裁员降薪，我顶着巨大压力告诉员工：“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一个员工失业。”我们不仅不裁员，还招聘应届大学生，按时足额发工资，自掏腰包为员工发放抗疫物资。因为我知道，员工是企业的根基，守着员工，就是守着企业的未来。

在公益路上，我也从未停步。自 2017 年起，我每年定向资助徐家棚街道困难学生，连续六年为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捐款捐物，累计超 13 万元；2021—2025 年向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款超 83 万元；疫情期间，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景德镇红十字会及定点医院、隔离点捐款捐物 24.64 万元，为景德镇抗疫医务人员送去 200 件抗寒大衣；我在公司打造“妇女之家”，成为武汉市示范妇女之家，为社区妇女搭建学习交流、提



向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捐赠物资

升自我的平台。这些年，我在公益事业上的投入超 400 万元，有人说我傻，可我觉得，企业的价值在于创造财富，而财富的价值，在于造福大众。

从景德镇到武汉，从钢铁到陶瓷，半世商途，钢铁炼就了我的坚韧风骨，陶瓷赋予了我的温润初心，钢瓷相融，便是我半生奋斗的最好写照。如今，我的企业年销售额近十亿元，跻身湖北省民营企业服务业百强，我也收获了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但我依旧是那个跑市场、盯项目、守在一线的于桂英。

熊秉坤：勋章，枪声，与溥仪的合影

◇ 彭 博

近日偶翻家中藏书《辛亥革命大写真》下卷，“文物篇”中《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跃入眼帘。20多年前，跟随从事



青年熊秉坤

文物工作的父母来到首义功臣熊秉坤之子熊辉先生家中，目睹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授予的勋五位章，当时还未捐赠辛亥革命纪念馆。如今我也从事文物工作，脑海浮现熊秉坤的几个遗物片段，速记下来以存史迹。

熊秉坤获“勋五位徽章”

勋五位徽章为银质、金银饰。圆形，中央圆版，饰一束嘉禾及红色珐琅上嵌珠（珠已脱落），辅以四轮，饰黄蓝白黑色珐琅，金饰轮边，五色喻中华民国共和五色国旗。上下二方黄、黑轮上各嵌珠一枚，二珠表勋五位级别。四轮下铸有饰绿色珐琅的八片牡丹花叶纹，银饰叶茎。勋章有一木制黑漆匣盒，正面有篆书“勋五位章”烫金字样。勋章及木匣盒设计构思新颖、制作精美。



父亲凭借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经验和勋章常识，问及应还附有纸本证书，熊辉告之已于1983年捐赠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熊辉保存的勋章与木匣，并未有授勋原因记载和人名标记，若不是珍藏者叙及，还真无法与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昌首义联系在一起。

现将《证书》原文抄录如下：

盖闻时逢走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陆军少将熊秉坤志炳丹青，术娴戎伍，援桴奋战。遂倾城社之凭陵，建纛扬威；克靖风尘之扰攘。前勋斯集，懋赏宜膺。本大总统依勋位令第一条授以勋五位，以嘉乃绩。启旧邦之新命，伯偃灵台；进小康于大同，氛销枉矢。此证。

袁世凯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日

《证书》系纸本长方形，长43.3厘米，宽32.3厘米；内容全部用毛笔手写楷书，正文直排11字10行，计109字，“袁世凯”署名和纪年号分列后两行，共121字，具体日期模糊不清，在年月行上钤有朱红篆书“大总统印”方章。

仔细读罢，感觉内容详实，行文流畅，工整对仗，十分得体，一证一文，非一般印

刷证书。全文意思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开头至“功莫先于首义”，主要记叙武昌首义前形势和首义事件地位。第二段从“陆军少将”至“克靖风尘之扰攘”，主要叙述熊秉坤其人、其志、其能、其事，如指挥军队奋战，执掌大旗，击溃敌军并使其丧失靠山，安定纷乱的局面。虽寥寥数语，皆字字点睛。第三段则是正文余下部分，褒奖熊秉坤并授勋依照法令，借机粉饰、标榜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番。

《证书》是对武昌首义头等功臣熊秉坤勋绩肯定的最早官方正式文件，依据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发布授勋命令的第四通为“杨玉如、刘英、熊秉坤，特授以勋五位”，其确切签发时间应为该日。文献记载，这件《证书》及熊辉先生保存的勋章与木制匣盒原件相互印证，证明了这套113年前的文物真实可靠。

《证书》非一般嘉奖令，内容对研究辛亥首义极具史料价值，是现存珍贵文献资料。民国初年对授勋非常慎重，按照规定有上报、调查事迹、审议核对、评定勋位、制作等一套严格制度；加上时隔仅一年有余，证明人员易于寻找，记忆不会有太大偏差。

当时袁世凯刚登上大总统宝座，其政治野心尚未暴露，社会各界对人对事的评价也客观公正，所以《证书》的史料价值高于其他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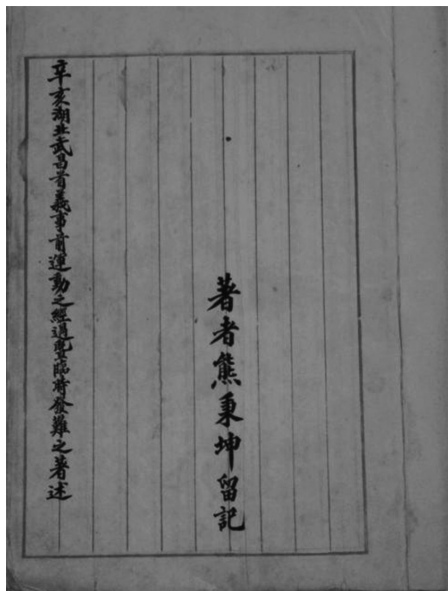
熊秉坤回忆“第一枪”

熊秉坤为武昌首义首功之人，在辛亥革命史学研究中毫无争议。但是，“谁是打响第一枪的第一人”即“首枪首人”问题，成为几十年来武昌首义当事人和相关人员及史学界“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涉及

熊秉坤、金兆龙、程定国（正瀛）、蒋楚杰四人，聚焦于熊秉坤与程定国。学者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是“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而并非熊秉坤”；一是“首义第一枪的制造者为熊秉坤”。双方使用的史料多是回忆追述文章，尤以熊秉坤1913年2月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8年的《武昌起义谈》、1956年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三篇为双方绕不开的主要材料。

“首枪首人”问题，其实缘起于孙中山。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寓所向其他人介绍相随的熊秉坤说：“这就是打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9年，孙中山又在上海为报刊发国庆贺词，开头即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从此有了“熊一枪”之说，也引起“首枪首人”问题十分较真的争论。

从《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看出，此文写于1913年2月，是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及时回忆首义事件的细节过程，以免以后遗忘。此时的熊秉坤心态应十分平和：



熊秉坤关于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的回忆

一是首义毕竟成功，自己和起义的弟兄未蹈黄花岗起义失败覆辙而幸免于难；二是自己在首义过程中的作为得到各方承认，1912年10月获授陆军少将，1913年1月获授勋五位章；三是撰文时手头有大量原始资料，如文中开头第一部分中“鄂工兵营革命军编制”名单、职务十分详细，其别名都能清楚列出，若无起义前的花名册实难做到；四是与金兆龙、程定国十分熟悉，毕竟是手下的正、副队长，尤其是程定国“现名正瀛”都列其上，可见熟悉程度并毫无过节，所以内容应是最为真实的实录，可信度极高。即便到1918年的《武昌起义谈》中，仍不计金、程二人后来所走道路而如实直书：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此时，熊秉坤将“第一枪”称号送与他人，其中应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尚未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比较单纯朴素，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和盘托出；其次是谁也没有把打第一枪举动作为一种评功资本。如邓玉麟的《致北京稽勋局公函》说，经“邀集同志，互相记忆前年有功人员”，结果上报685人中，有熊秉坤、吴兆麟，包括工程八营打第一枪在场的直接当事人金兆龙都榜上有名，并列入头等（甲种），独不见熊秉坤两次所言打了第一枪的程定国。邓玉麟拟定的名单应在5月底以前，此时二次革命尚未爆发，程定国尚未堕落为军阀爪牙，因受党人排斥而未上报之说根本不存在。只能说明，程定国即使打了第一枪但并非首义成功的关键——在当事人和知情人心目中，既没有认为这是英雄壮举值得推崇敬仰，过后也无评功价值。

打第一枪并不难，如武昌首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发动大小十数

次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枪打了但未“响”，义起了但未成功。打枪要“响”，起义要“成功”才是问题的关键。

熊秉坤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真实记录了发动首义的艰辛和惊心动魄。作为一个真正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在事前有成熟的纵观全局的独到看法及具体谋划方案，并得到上级认同，“术娴戎伍”之誉并不过分。起义前夕，多次联络协调各方，积极促成起义，置生死于度外“志炳丹青”，不仅自我践行，并传导有效带动队伍，尤其可贵的是指挥队伍“援桴奋战”。在关系到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军事行动命令果断，军情处置十分正确。这一切，都构建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响”起来之实，如果没有这个实，程定国即使放了第一枪，没有后续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军事行动，这第一枪实际成了虚——虚的一枪只能导致起义失败。

因此，笔者在此冒昧地揣摩一下当时的情形：事先熊秉坤因情况有变，数次更改起义时间，最后“改至日暮，听坤枪声为号”。金兆龙和程定国生事和偶发的打枪“走火”之时，正与约定时间、信号大体吻合。起义士兵分散在各自营房，对金、程那边发生的事无法知道，在高度紧张中听到枪声，误以为是约定的营总代表熊秉坤发出的号令，于是群起行动。

我们不妨推想，如果不是金兆龙过于紧张被敌排长陶启胜发现，或金能制服陶，或程定国赶来能用枪托悄然无声地打死或打晕陶，也不至于有这走火的一枪。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熊秉坤在十分有把握情况下，要么自己朝天放枪，要么命令部下朝天放枪，正式发出起义信号。程定国这一枪放得也十分冒失，倘若提前一两个时辰，会导致

敌人突然增兵，军情大变，只能使起义计划暴露，中国历史上也许就没有“武昌首义”了。事后对程定国这一枪，除不同版本记录在案外，均无给予肯定和表彰的记载，自然可以理解。

熊秉坤的首功，建立在策划、串联、动员、组织等脚踏实地的基础之上，是使枪打“响”的第一人。工程八营的集体发难行动并且成功，是整个武昌首义的“第一枪”，熊秉坤是这个集体中的杰出代表，“辛亥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第一人”当之无愧。

跨越时空的合影

在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杏黄色毛哔叽风衣特别引人注目，虽然距今已经有60多年，但依旧干净整洁，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这件衣服的主人就是熊秉坤。



熊秉坤穿过的风衣

1961年10月，受董必武邀请，76岁的熊秉坤作为筹委会委员，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这么隆重的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这问题可难倒了平时衣着朴素的熊老。不过，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在武昌大成路大强服装厂定制了这件杏黄色毛哔叽礼服，价格280元，可谓不菲。出发那天，他穿着这件风衣赶往火车站，张体学亲自到火车站送行。



熊秉坤与辛亥老人的合影



熊秉坤（左一）与溥仪（中）、鹿钟麟（右一）合影

1961年10月10日，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从收藏的纪念大会主席台照片中可以看出，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功勋坐在第一排位置。盛会期间，熊秉坤还穿着这件风衣参加了多次重要活动，11日的《团结报》，就刊登了他和辛亥老人温楚恒、李白真一同游览颐和园的报道。

熊秉坤逝世后，子孙将这件风衣作为传家宝完好保存。2017年10月10日，熊秉坤的孙子将这件风衣无偿捐赠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这件风衣，不仅承载着首义情怀，更凝聚着党和政府对辛亥老人的尊重与关爱。

正是在这次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盛会期间，周恩来总理特地在全国政协第四会议室，安排末代皇帝溥仪和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的历史性会见。

据熊辉回忆，父亲当年从北京回来后，经常同我们念叨那场景：溥仪笑着对熊秉坤说，原来当年是你害我从龙椅上滚下来！熊笑着回答到，你是被人抱着坐上去的，龙椅上不好玩，还是下来的好！溥仪又笑着对鹿

钟麟说，是你让我无家可归呀，你在景山上架大炮要轰我，可把我吓坏了！鹿也笑着回答到，那是让你出宫看看世界呀！当年在景山上架大炮是吓唬你的，没有的事！随后有人倡议三人合影，鹿笑着对溥仪说，您当年是皇帝呀，应该坐在中间！于是溥仪坐中间，两手左右相拥熊秉坤、鹿钟麟，非常亲热。记者纷纷拍照，闪光灯闪个不停，留下这张珍贵的历史瞬间。

起义门城楼上的弹痕至今犹存，几个历史瞬间组成的拼图，勾勒出熊秉坤从首义志士到历史符号的生命轨迹。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这些文物时，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遗物，更是历史如何在记忆与遗忘的博弈中不断回到现场。

彭博，江汉关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水利专家陶述曾的青山缘

◇ 张玉琴 孙君恒

陶述曾，新洲仓埠人，水利和土木专家，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兼水利厅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5岁时到过青山镇，从事水利工作后对流经青山的长江航道尤为关心，强调



陶述曾（1896—1993）

青山峡（青山矶长江水道）运行的必要性，对其因势利导发展提供良策和寄予厚望。

1901：童年路经青山峡

陶述曾老家新洲仓埠，小时候从阳逻经青山到汉口，对老青山记忆犹新。他在1985年回忆：“1901年，就是我在84年以前，还是个小孩子，来到武汉，那时青山只有一条小街，现在青山成了红钢城，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1901年陶述曾5岁，看到的长江水位较低。青山古渡每到10月就进入枯水期，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可见青山峡较浅。当时航道均在北汉，以后南汉慢慢发展，直到1950年代，青山峡才逐渐通航。

1982年5月20日，陶述曾在武汉河段整治规划学术讨论会上说，经过81年时间，南汉已演变为主汉，北汉却成为支汉了，演变的周期还是较长的。目前南汉正处于发展

阶段，北汉正处于淤积阶段，这便是长江武汉河段的自然发展趋势。

1954：抗洪关注武青大堤和武丰闸

武钢选址的时候，考虑青山地区地势较高，非常有利于防洪。陶述曾赞扬青山的武丰闸质量好，在防洪中发挥了积极效用。水闸漏水是普遍现象。武汉数十道水闸中，青山的武丰闸是唯一不漏水的。漏水原因，有的是建筑老了，闸身砌缝漏水如最大的武泰闸。大多数是无人管理，闸门没有关好，如汉口最大的排水总口岱家山闸。1954年的大洪水，给防汛管理人员敲了一次警钟。

武青堤（铁机路—武丰闸段），1954年一度岌岌可危。陶述曾作为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总工程师，负责统领全局技术工作，10天10夜坚守在大堤上，反复巡查发现问题，调查研究寻找对策。

陶述曾以亲身经历指出，“汛期中发生的险情，长江大堤以散浸和管涌最为普遍，其次是基地底层的青沙管涌，以武青、武金及汉口沿江堤下段为多”。武昌的武金段和武青段，堤内多有取土深坑，坑底暴露出冲来的青沙。1954年大洪水时，青沙管涌很多。青沙来自堤内的取土坑、水塘或稻田，接近堤脚。管口涌出微沙，江水冲刷土壤普遍存



在，水出口冲力很大。

陶述曾特别强调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科学防汛，显示了水利专家因地制宜的智慧。他说：“我们处理青沙管涌也是用倒滤井的方法，后来在黄沙层下加铺一层青沙，是武汉建筑业常用的青沙，就制止了微沙的穿透，防渗防散浸堤坡的效果不错，多次的实践证实了很有效。武青堤大脱坡时，因石砂费工，改用芦苇卷筒填满碎石填港沟，效果很好。”

陶述曾在《武汉市1954年防汛技术的经验与教训》（《人民长江》1955年9月28日）总结中指出，武青堤防汛初期曾在堤内脚打桩进行尝试，但9公尺长的大桩都被土坡坍塌压倒或压断，并发现打桩穿破黏性土壤覆盖层，会引起青沙管涌的危险性，此后就不在堤防加培工程中打桩，在抢险中也很少用打桩阻止土坡滑脱的办法。

1977：让孙子到武汉钢铁学院读书

1977年，陶述曾的大孙子陶震参加高考，榜上有名。陶述曾主张孙子到青山武汉钢铁学院深造，因为毛泽东主席强调“工业以钢为纲”。钢铁是国家的基础产业，陶述曾作为北大、北洋大学（后来为天津大学）的高材生、水利土木专家，深刻认识到技术立业的重要性。

当时钢铁学院地位很高，北京有“北大清华钢老三”（北京钢铁学院为第三）的说法，武汉则是武大、华工、钢院赫赫有名，为家长和考生所青睐。于是，陶震成为武汉钢铁学院1977级机械系本科生，在青山度过四年宝贵时光。机械系走出过刘玠院士（曾任鞍山钢铁公司董事长）、苏义脑院士（石油钻探专家），学风炽盛。

1982年，陶震本科毕业，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到武钢发挥自己的机械专业特长，而是按照湖北省委有关部门的安排，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报到，成为爷爷陶述曾（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秘书。祖父时年86岁，身边非常需要人，他确是不二人选。1993年爷爷去世，他继承家风，主动搬出爷爷的省级干部家属院。



长江河道青山峡

1982：强调青山峡有利武钢发展

1982年5月20日，陶述曾参加“武汉河段整治规划学术讨论会”，发言时认为：长江水道南边的青山峡，开始是相当早的。武汉的长江河道，应该走青山峡，把这一段整成单一河段，不再分汊。武钢已在青山峡投资很多，建立了取水工程码头，不能让长江走北边河道，把青山峡淤掉。那样，武钢就很不方便。在下游，阳逻也是个据点；再远一点看，龟蛇山以上，还有大小军山据点；阳逻十里山以下，还有葛店、白浒山。这样一段河势是基本稳定的，摆不到那里去。青山峡现在稳当得多，不能让它再往北汊变回去（长江武汉河段河道整治工程技术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市河道科研所：《长江武汉河段整治研究文集》第1集，1987年，第47—48页）。

陶述曾分析了长江武汉河段百年来的演变和发展趋势，非常有前瞻性，今天看起来仍不失效。他强调，河段管理的原则应该是“因势利导”，搞水利应当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来改造自然。

整治河段的规划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家讨论发表很多意见，有的说江滩的形成是因为长江大桥，有的说与丹江口水库有关系。陶述曾认为：这与丹江口恐怕没有很多直接关系，如其考虑距汉口600多公里以外的丹江口情况，还不如考虑一下水流本身顶冲点的变化。武汉河段下边是阳逻，长江向东流转了一个90多度的大转弯，这个大转弯在涨水和落水时，顶冲点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上提下挫。黄河有句话，叫作“一弯动弯弯动”，有一弯的地方动了，上下相邻的弯都要动的。长江水量大，涨水和落水的每一过程上提下挫都是动的，这个影响比丹江口要大一点。汉口江滩的落淤，不一定是丹江口下来的。当然不能说丹江口对这里没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汉江没有丹江口的时候，最小流量只有几百个流量；有了丹江口，最小流量要稍大一点。丹江口有调节作用，但影响不大。长江大桥也会有些影响，但大桥桥墩都是顺流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青山的江滩淤泥，与丹江口水库、长江大桥的影响关系同样不大。

1985：指出河道整治需要前瞻

长江是一条闻名世界的大河，武汉河段的治理是一项有影响的巨大工程，必须遵循

治河的最高原则来进行，这个原则就是古今中外无数治河专家总结出来的“因势利导”。

1985年6月9日，陶述曾在“长江武汉河段河道整治技术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对“因势利导”解说得十分清楚，并且着重说明“势”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势”，是指自然河流自然发展的趋势。第二“势”，是指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态势、趋势。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讲因势利导，不是自然发展规律来支配人类的生活与生产，而是要根据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利用自然发展的趋势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使之有利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使之服务于人类的需要。武汉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港口码头、取水用水，还是城市建设布局与防洪等，都要求河势稳定，顺应城市发展的需要。1985年，长江的河势的演变，已经给航运、港口、取水、用水、城市布局以及防洪等都带来了困难，都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对河道进行整治。因此我们要根据河势与经济发 展的形势需要，来进行“利导”即采取整治措施。

河道整治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保持双汉，上段白沙洲，下段天兴洲维持现状，采取一些工程措施，控制天兴洲南汉的发展，扭转北汉淤积的趋势，使淤积变为冲刷，来满足港地与用水要求。另一方案就是从沌口到阳逻50公里，根据现有河流的发展趋势，按主流路线改造成为单一河道。

陶述曾认为，单一河道方案既符合因势利导的原则，也符合舍支强干的整治方向，这也是他在治河中多年积累的经验。单一河道比较稳定，不会出现分汉。河道主支汉周期的交替演变，给武汉建设布局带来较多困难，他之所以赞成单一河道方案，也是根据大量资料分析而得出的结论（长江武汉河段

河道整治工程技术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市河道科研所：《长江武汉河段整治研究文集》第1集，1987年，第49页）。

从武汉关顺着治导线一直下去，把北边泓道逐步堵死，堵法可以考虑几种方案。陶述曾建议，天兴洲北汉不一定马上堵死，最好让水流能过去，水过去才能带泥沙沉积，比填土要省事得多。他举例说，汉江钟祥堵遥堤那个口子，有土的地方都有水，只得在大堤内取，就仿照黄河上的办法，在外面做了几道透水坝，使那个地方淤落不少，后来就可以在堤外取土了。陶述曾认为，如果天兴洲岛北边的泥沙淤起来，就会有不小的一片土地，因此中间还是保留一个水道为好。

陶述曾预见，将来武汉可一直沿着长江发展，前景无量。“黄金水道”需要综合考虑，加以利用和治理。水利需要防患未然，应对洪水是底线要求。有的地方做些水闸还是必要的，应该尽量利用、控制自然状况，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为武汉社会和经济发 展服务。

目前，武汉青山的石化产业带、武汉长江新区、阳逻深水码头、新洲双柳的航天城和船舶城等，无不印证了陶述曾老人家的设想。

张玉琴，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兼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时坚请梁启超来汉讲学

◇ 肖朝晖

陈时，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907年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宏文书院、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在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1909年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学成归国，参加辛亥革命，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民国成立后，与其父陈宣恺毁家兴学，在武昌粮道街和县华林创办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后更名为中华大学。这是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一度与天津南开大学齐名，史称“南有中华，北有南开”。陈时抱持教育

救国理念，矢志教育事业，主持中华大学长达40年，为学校发展竭尽心力，有“清苦的教育家”之誉。

1950年，陈时加入民革，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华大学撤销，相关学科分别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和武汉大学。1953年，陈时病逝于武昌。

202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陈时论著选》，收录了陈时的各类文章，按分类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1891—1953）

编年体例，依照文章性质，分为“撰著·译文”“公启·函电”“演讲·谈话”等七辑，为陈时作品的首次系统整理。

创办中华大学暑期学校

1920年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的推动下，国内兴起创办暑期学校的热潮。1920年，郭秉文、陶行知等留美归国学人，秉持“推广教育、补助学业”的理念，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暑期学校，是为民国暑期学校之滥觞，“我国有暑期学校，始自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

南高首届暑期学校招生超千人，取得良好社会效应，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力，“自从民国九年，南京高师开办暑期学校，学者近千人，颇能盛极一时，大家觉悟暑期教育的价值”。此后，南

开大学、中华大学等南北多所高校，纷纷效仿设立暑期学校。东南大学校长、南高暑校的主要推动者郭秉文，1923年撰文回顾说：大学推广事业，则暑期学校或讲习会，“除东南大学赅续历届办理外，北京高师、南开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与教会设立之金陵大学均设暑校焉”。

1922年是中华大学10周年校庆，经过10年苦心经营，学校已初具规模，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7月，学校大礼堂竣工，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讲学活动提供了场所保障。在蓬勃发展的暑期学校热潮影响下，“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扩大学校影响”，中华大学创办了暑期学校。陈时利用自身人脉关系，广邀国内一流学者来校讲学，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等学界翘楚均在邀请之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章、蔡、胡等人均未能来鄂。

四条理由打动梁启超

1922年8月29日—9月8日，梁启超应邀来汉讲学近10日（其间9月1日—2日赴长沙讲学），受到中华大学及武汉各界热烈欢迎，是为武汉和湖北教育界一大盛事。关于此次讲学，《梁启超年谱长编》有简略记载，“先生以八月二日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各处均有讲演。八月杪赴武昌及长沙，先生居长沙两日，武汉数日，始经河南返津”。李明作《1922年梁启超武汉讲演考实》，根据武汉及上海、天津、长沙等地报刊资料，详细梳理考辨了梁在武汉的讲演日程，弥补了《梁启超年谱长编》过于简略的不足。

如所周知，梁启超来汉讲学是受陈时邀请，然学界对邀请的具体情形则所知不多。

裴高才等在《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一书中称：“接到老朋友陈时的邀请后，他（引者注：指梁启超）欣然应允”，实际情形并不如此顺利。2015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以下简称《稿本》），其中第15册收有一封题为《陈时致先生书坚请临鄂讲学》的信札抄件，内容正系陈时邀请梁启超来汉为中华大学暑期学校讲学。这一函札，在根据《稿本》整理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等梁启超年谱资料中均被删去，亦未被《陈时论著选》“公启·函电”部分收录。鉴于此信尚未被研究者注意和利用，兹标点整理如下：

新会先生道席：

顷奉教言，敬悉一是。时前日始自东南大学归来，夏期讲习会在南京部分者，如刘伯明、陶知行诸君大致确定。蔽校开讲期间系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查与南开、东南均无冲突。且希望钧座来讲，远在年半以前，并经过两次之失望。湖北方面教职各员，大半系受过先生《新民》《清议》《国风》《庸言》中华各种历史上之教育，有深切印像者，一般学生尤爱读先生最近之讲演录。至时与先生过去政治上之关系，尤其余事。以此在诸因，对于先生实有特别信仰，倘令一般人有第三次之失望，时实异常负咎。敢请台驾于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之间，任择数日来鄂讲演中国文化史上之问题，以饯众望。至一切招待方法，均遵照东南成例办理。此间拟出广告，即将台銜首列，鹄列训示，无任迫切。（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陈时与新会先生书）

此信情真意切，对梁启超来校讲学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陈时的诚恳和所陈述的多条理由打动了梁启超，梁启超最终接受了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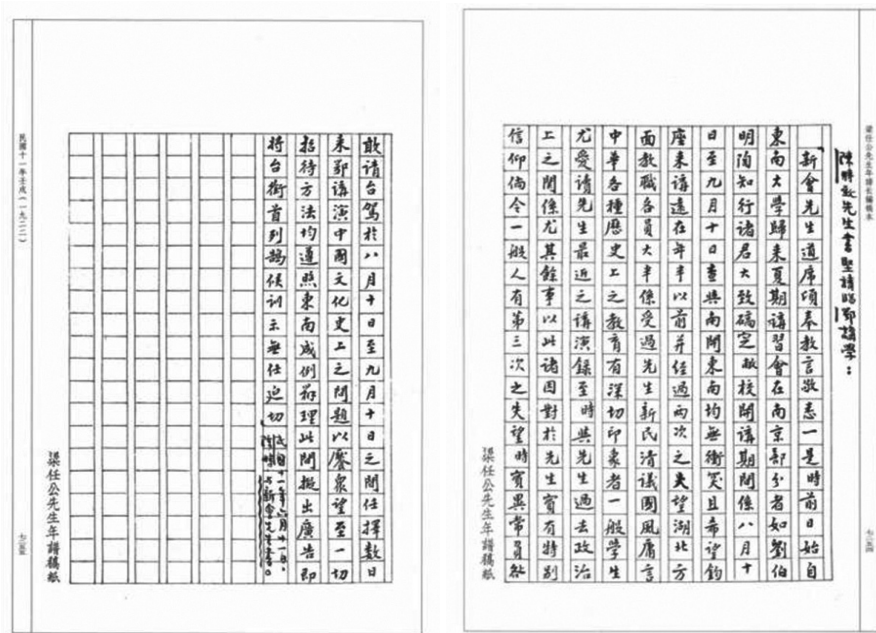
学邀请。陈时在信中称“前日始自东南大学归来”，陈时赴东南大学很可能即是向陶行知等人请教办理暑期学校的相关经验，陶氏是南高的首届暑期学校校长（南高在1923年合并于东南大学）。

自1917年退出政坛后，梁启超投身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于全国各地讲学不断。1922年对梁启超而言可谓“演讲年”，演讲活动和邀请极为繁多，除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北京高校发表演讲外，还赴天津、南京、上海、南通以及武汉、长沙、开封等地讲学。其中天津、南京即是应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邀请。

鉴于梁启超繁忙的讲学活动，陈时特意查考了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校的开办时间，“蔽校开讲期间系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查与南开、东南均无冲突”，首先从时间上打消梁启超的顾虑，此为理由之一。

据信中所言，陈时“远在半年以前”即1922年初已向梁启超发出讲学邀请，此番去信已是第三次邀约，足见其诚意之深，此为理由之二。

接着，陈时向梁启超表示，湖北大多数教职员都受过任公各时期所办报刊影响，并提及学生尤爱读梁启超最近的演讲录。“受过先生《新民》《清议》《国风》《庸言》中华各种历史上之教育”，应指清末民初梁启超在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如《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最近之讲演录”应指杨维新所辑《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2月出版，收录了1921年10月至12月间梁启超在各地的演说讲7篇，含《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市民与银行》《无产阶级对有枪阶级》等。2月



陈时与新会先生书

出版的演讲集，6月即为鄂省学生捧读，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当时广大青年学子的强大吸引力。陈时着力彰显梁启超对湖北地区教师及学生的影响，试图以此吸引梁启超前来讲学，此为理由之三。

陈时与梁启超为昔年旧识，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1907年，梁启超与蒋智由一行又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主张立宪政治，并在此期间与陈时相交相知”。早在15年前，陈时即与梁启超相识，但并未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至时与先生过去政治上之关系，尤其余事”，不过既已点出，无疑还是希望梁启超能看在旧识的情谊上移驾武汉，此为理由之四。

综合上述多重理由，陈时极为恳切地希望任公能来汉讲学，“以此在诸因，对于先生实有特别信仰，倘令一般人有第三次之失望，时实异常负咎”。另外，据此信可知，陈时邀请梁启超暑校讲学的题目初定是“中国文化史”，当源于前一年即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讲稿成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为充分体现对梁启超的重视，陈时还特别表明接待办法按照东南大学的成例办理。

该函末尾标示“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陈时与新会先生书”，这一日期应为信函的写作时间，即1922年6月11日。梁启超的复信今未见，不过面

对陈时的多番诚挚邀请及其陈述的多方理由，梁启超最终答应了本次邀请，他在7月24日致徐佛苏的信中已对赴汉行程作出安排，“盖弟在此暑期中之日程，数月前早已安排。本月二十九在南开讲毕，八月二日即赴南京……二十五日至九月初十赴武昌讲”。及至中华大学暑期学校开讲前夕，8月12日天津《大公报》刊出梁启超将赴鄂讲学的消息：“武昌文科大学，现拟聘梁启超、章炳麟等名士，开夏期讲习会，章辞以危邦不入，惟梁订二十五日后来鄂，学校现已预备欢迎。”

8月29日晚，梁启超终于携子思成、思永由庐山乘船到达武汉，开启为期近十天的讲学。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期间，梁启超除为中华大学暑期学校讲学外，还应武汉军政商学各界邀请在各地讲演不断，留下《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其将来之责任》《互竞与互助》《青年元气之培养》《女权运动之步骤》等与湖北历史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演说。

梁启超讲学及暑期学校的影响

以暑期学校为代表的中华大学名人演讲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时在回忆中指出，出于对北京大学学术自由风气的羡慕，他在办学时“采取广大范围”，意即兼容并包，广延名师讲学授课，“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黄炎培、太虚诸先生，都在校讲过学”。

1922年中华大学暑期学校邀请的学术名家和社会名流除梁启超外，还有陈鹤琴（心理学）、傅铜（哲学）、黎锦熙（国语）、廖茂如（“中等教育”）、张子高（“理化教学法”）、太虚法师（“因明论”）、高一涵（“政治思想史”）、黄炎培（“职业教育”）等人，“聘海内学者二十余人主讲，听讲者三千余人”，名流荟萃，盛极一时。

1922年中华大学暑期学校颇为成功，“每日到暑校听讲人，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近日暑校大有人满为患云”，当时有报纸称之为“鄂省空前之暑期学校”。暑校对前来听讲的青年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作家胡风在武昌中学读书，曾随友人一同赴中华大学暑期学校听名人讲演，胡风夫人梅志在《胡风传》中写道：“他们（引者案：指胡风等人）还一同到中华大学去听暑期演讲会，有梁启超、高一涵、杜金舒等人。这些名人的讲演，对他们很有影响，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探索精神。”1922年考入中华大学教育系、后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王亚南，回忆大学时光时指出，中华大学对其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学校举办的各种名人演讲，“给我更大影响的，却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位颇有活动精神的人，他特别看重学校的课外教育。‘名人

讲演’，简直成了太寻常的事。居‘天下’之中的武昌，往来的中外名人，无论是学术界的、政界的、经济界的，都须在他的学校缴纳一点过路的‘精神税’，他特别建筑一座可容二千多人的大礼堂，以成此盛举。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太虚法师、余日章、张君勱、杜里舒博士（注：《胡风传》中译为杜金舒）、马寅初、陶行知、孟禄博士、黄炎培以至半中国人的何东爵士……都是在那个礼堂‘大放厥词’过的”。

创办暑期学校以及邀请梁启超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是中华大学办学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时抱持教育救国理念，充分利用自身在学术界、政界的人脉关系，广泛邀请全国各地名流学者讲演，开拓了师生视野，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在中华大学乃至武汉、湖北的传播，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曾对中华大学的名人演讲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中华大学尽管在办学条件与师资队伍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能敞开校门，广泛延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营造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乃至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宽松环境。”

肖朝晖，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不慕浮华，不逐红火：张舜徽先生追忆

◇ 姚伟钧（讲述） 李思宇（访谈）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国学大师，也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张舜徽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张淮玉学识渊博，亲自为他启蒙，授以文字、声韵、训诂及经史典籍，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小学（语言文字学）和经学基础。他未曾进入新式大学接受系统教育，而是走了一条独特的自学成才之路，负笈游学于长沙、北京等地，得以向杨树达、骆鸿凯等前辈请益，并广泛结识学界名流，深刻体认到“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传统治学门径。1950年后，他长期任教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成就了他学术创作的高峰。

张舜徽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通儒”型学者，根植于深厚的国学传统，又能面向现代学术体系进行开拓与创新，在经、史、子、集四部中自由穿梭，相互印证，研究涉及《说

文解字》的文字训诂、清代学术的梳理、周秦诸子思想阐发及历代文献考辨。他潜心著述，将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与明晰的现代学科意识相结合，留下《说文解字约注》《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等著作。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张舜徽独立撰写了百余万言的《中华人民通史》，突破传统王朝史体系，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从地理、社会、生产、制度、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重构中国历史叙述，展现了史家的通识与创新精神。

1979年，张舜徽参与发起并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推动文献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他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在华师创建历史文献研究所。由此，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向得以正式确立和发展，居功至伟。

张舜徽先生是我的老师，从前和我闲谈时说过一句话：“我这人啊，一生就偏爱清淡，不爱追逐红火。”他说得极其寻常，仿佛在说“今天天气挺好”似的，我却一直记到今天。

张先生所谓的“不逐红火”，并非指他学问不高，而是说他不喜凑热闹，不争名逐利，一辈子在灯火阑珊的书斋，做实实在在的学问。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张先生，是听他谈起撰写《说文解字约注》的往事。那是“文革”期间，他住进学校澡堂。澡堂不是如今的小隔间，而是旧式的大池子，空荡而潮湿。他就搬来一个小板凳放在池沿，趴在那儿写。后来提及此事，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写坏了53支毛笔。”我听着，心里不由一颤。

张先生说得甚至有些平淡，我却仿佛看见他坐在那里，一笔一画，写得那么专注。池子早已干了，澡堂里或许还残留一股味儿，但他不在乎，小板凳一放就是书斋。那53支毛笔，如同53根细细的支柱，悄悄立在了我的心底。

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有时觉得疲惫，有时难以静心，坐不住的时候，便会想起那个画面——张先生在那样一个地方，依然能坐得安稳，写坏一支笔再换一支。

张先生还常对我们说，读书人不能只会读“有字书”，还得会读“无字书”。什么是无字书？就是生活，就是寻常日子。关在屋里死读书，读出来的字是僵的；得走出去，看看人间烟火，摸摸柴米油盐，学问才会有生气活起来。

张先生讲解《说文解字》时，就说里面许多字都与“食”有关。为什么？因为“民以食为天”，人活着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若不懂古人如何耕种、如何生火、如何烹食，那些字就认不真切。他讲“酒”字，会说起湖南老家如何酿酒，那是他亲眼见过、亲手试过的。学问从他口中道出，总带着泥土气息，听来格外踏实。

先生也看重读书人的“见识”。他说，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光看多勤奋，还要看眼光多宽多亮。见识从何而来？从书中来，也从路上来；从思索中来，也从实践中来。他鼓励我们年轻时多做事，哪怕是办办学生活

动、跑跑社会调查，都是开阔眼界的机会。

张先生自己便是如此做的。他读清代文集1000多种，并非泛泛翻阅，而是每一部都认真细读并写一篇札记，写了600多篇，评点其人其学。那般功夫不声不响，把学问做到骨子里。

我后来研究饮食史，也正是受张先生的影响。正是他那本在1956年除夕完成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让我第一次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写豆腐如何点成，写糖如何熬出，写那些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的创造。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研究中国人如何饮食、如何生活，撰写《中国饮食史》，探析长江、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史。前些日子，我在央视讲述“糖的故事”，讲着讲着，又想起张先生书中的那些段落。回头再翻翻，依然觉得扎实而亲切，丝毫未随时光褪色。我如今越来越明白，他不是不能红，而是不愿红。他选择了一条安静的路，一张小板凳，一支笔，就是一生。他的“红”，不在外面，而在那些他写下的字里，在他教过的学生心中，当然，也在我心中。

那张小板凳，其实他也传给了我。不是实物，而是一份能坐得住的定力。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外界多么喧闹，心里总要留一处能安静下来的角落，一笔一画，把该做的事做完。

有些人红一阵子，便没了声响。张舜徽先生一辈子看似“不红”，却让人一生也忘不掉。

姚伟钧，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思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近代汉口的民信局

◇ 王 耀 高艺丹

民信局，顾名思义乃“民间信局”之意，主要从事民间邮件寄递服务业务，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邮驿及近代国家邮政而言。近代汉口因其重要的商业中心及交通枢纽地位，民信局发展颇盛，一度成为长江中游的中枢。

汉口民信局的兴衰

据考，民信局兴起于“明代永乐年以后，而以宁波为其中枢”。民信局的出现与历史上的“绍兴师爷”息息相关，“是时之前，所有驿递，除供王事之用外，其组织及办法实未完备。是时积习，凡属缙绅之，辈宦游必携幕友，职备顾问，又兼案牍，伊等与各省往来函件甚多，民局之事业由是肇基焉。幕宾大都籍隶浙江绍兴，而宁波为绍兴之口岸，民局即滥觞于此。嗣后全国私立之信局，咸以此处为中枢”。

其后，由于商业往来的逐渐频繁，信息、商品等传递的需求持续增长，民信局“于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交为最盛，初仅沿海各省有之，后渐推广于内地，

远届东三省及陕甘新疆。当其最盛时，全国大小信局，无虑数千家”，“东西南北无不设立……大而都会，小而镇市，皆有其足迹焉。书函之外，银物亦可寄递。遗失者偿之”。

在全国的民信局版图中，江浙地区大都将总局设在宁波、杭州和上海，东南沿海则设在福州，华北大多设在天津，长江上游多在重庆，汉口则为长江中游的中心所在。

汉口可考最早的民信局，为创办于道光二年（1822）的胡万昌信局，一直营业到民国年间，据1930年所编《交通史邮政篇》所载，该信局当时设有八个分局，主要沿江上游一线布置。

晚清时期，汉口民信局迎来一波发展高峰，同治元年（1862）十一家，光绪十七年（1891）二十七家。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口界有四十七家挂号民局。营业用有五十至八十名之信夫。经过一千七百里之寄路，总封信件增至七十七万多”。宣统二年（1910），受时局影响，数量有所下降，“在汉口挂号民局二十三家，现仍存留其紧要之脚夫，信路乃系由汉口经樊城以抵老河口，又由汉口至羊楼洞及由汉口至沙市等路。然

其紧要之营业平常信件尤在其次，其重要之财源乃系由带寄货物、现银、钞票及信件内装有值价之物类所得”。

进入民国后，汉口民信局数量基本维持在二十家左右。1924年，在汉口邮政局登记的有二十二家。1930年，“汉口信局共计二十七家，专行汉口以上者（俗称上河的信局）十一家，专行汉口以下者（俗称下河的信局）十六家。已在邮局挂号者凡十七家。以走下河者居多数”。在二十七家民信局中，规模较大的有“老福兴、乾昌、太古晋、协兴昌、政大全、福兴、正和协、全昌仁、全泰强、汪洪兴、李永隆、吴裕、陈永昌、胡万昌、森昌、全永盛、公利、张瑞丰、万昌诸家”。到1934年，据南京交通部统计，汉口有民信局总局十二家，其他各地开设的分局二十六家。其后，伴随南京国民政府对邮政事业国有化进程的推进，民信局逐渐被取缔，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汉口民信局的组织运营

民信局因起源于民间，故其规模简陋，“多不求形式之宏伟，每就陋巷小街，僦屋一廛设之。铺面高悬招牌，大书某某轮船信局，或仅某某信局。投送地点即详列于下方”。民信局店员人数多少不一，多则数十人，少则二三人，但主要职务大致可分为八大类：“账司一人，管柜一人（多由一人兼任），收信物一人乃至四五人，送信一人乃至四五人，挑货一人（小局多无），杂役一人（小局多无），厨役一人，脚夫二三人乃至十余人（轮船信局多无）。”

汉口民信局的内部组织架构，与其他城市的民信局大同小异。通过对协兴昌的解剖，大致能一窥汉口民信局的组织运行模

式。协兴昌东家姓朱，宁波人，其雇佣工人亦多为宁波人，该局之组织如下：账房一人，一个月五串；杂役一人，一个月二串；上街的四人，一个月五串；厨子一人，一个月二串；下河的一人，一个月二串。账房先生在账房受理邮件、收支金钱、记录账簿；上街的往来于各商店主顾间收集邮件或配送邮件；下河的搬运应发送之邮件于邮政局，或汽船邮件到达时为受取之事；杂役为随时从事杂役者；厨子通常为一人，忙时亦有添至数人者。该信局每日收入支出各约百余串。

汉口民信局主要经营业务有五大类：一是普通信业，“与邮局业务相等，有时范围尤广于邮局，一般信局皆经营之”。普通信业又分为特别信业、代寄包裹、挂号信物、汇兑款项四种。二是代派报纸，“多与各地报馆联络，批发大宗日报杂志，带往各埠，令送信人随时发卖”。三是运送业，为旅客提供货物搬运服务。四是银行业，提供各种兑换钞票业务。五是商业及其他杂业。

汉口民信局业务地域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上河的，由汉口上扬子江者（凡行陆地者包含之）；下河的，由汉口下扬子江者”，其中下河的“属于轮船信局，已登录于邮政局者总计十七所，亦占下河的信局之大部。”《中国经济全书》对其大致业务情况有记载。

汉口民信局的邮资主要依据路程远近而设置。在上水方向，去云南及四川成都、丰都等地200文；去河南、湖南、陕西、贵州及四川重庆100文；去耒阳60文；去安徽及湖南郴州等地50文；去益阳40文；去常德30文；去沙市、宜昌、长沙等地24文。在下水方向，去山东、广东、福建及天津、香港、北京、汕头、厦门、徽州等地100文；去景德镇、淮安、清口、苏州、嘉兴、杭州、

绍扬等地 70 文；去大通、蕲州、温州、江西、武穴、安庆、芜湖、泰州、运曹、九江、宁口、吴城、无锡、常州、扬州等地 50 文；去兴国 40 文；去上海和宁波 80 文；去南京和镇江 70 文。此外，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汉口民信局之间还交换邮件，互为转送，联合经营，形成通信网络，定时定线发运邮件。

汉口民信局发展的鼎盛期在晚清时期，由于现代邮政体系的不完善，故民信局的业务呈逐年增长之势。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邮政事业的管理，对民信局实行种种限制，如提高邮运资费、不准自运邮件等。民信局业务每况愈下，揽件数、邮件重量虽然偶有年份增长，但整体上的下滑之势不可阻挡。

汉口民信局的终结

民信局创设于现代邮政体系未建立之时，“在昔时实为带递信物最可考之机关”。1840 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下，清王朝逐渐建立现代邮政体系，对民信局的打压控制亦随之开始。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理衙门在奏设创办现代邮政折中称：“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益，并准赴管局报明，领单照章，帮同递送。”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清邮政的主要操盘手——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就如何处理民信局致电总理衙门，方面承认民信局“已多历年所，弥漫全国”，且“已造成一种良善生活，并以妥当与便利之方法为多数人递送函件包裹等物，故其地位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强调对民信局“须加以整顿，又令凡经注册者，得送发各埠间之邮件等物于大清邮政局。又关于传递信函等物于内地各处，皆收揽彼等为大清邮政局之代办机关”。光绪

二十五年（1899），清廷正式颁布《大清邮政民信局章程》，其中对民信局的登记注册、业务往来、邮递资费、挂号领据等进行了详细约束：“凡未挂号民局及他项商民，擅自私行收寄投送邮政应寄之信函为业者，一经察悉，每一封可酌量罚银五十两。”

除了在业务经营发展上进行管控外，清廷还在邮政运输工具上设置诸多障碍。光绪二十九年（1903），外务部在核准运邮章程时规定：“铁路只允许中国邮政官局运送包件，其民局及别国官局邮件盖不准行运送……嗣后铁路推广各处，均须照此章程办理。”

同年，汉口邮政总局邮政司包诺芬，对汉口民信局借用铁路运送信件一事特地报告，要求制定章程予以禁止：“本处有未挂号之民局袁万昌，已挂号之轮船信局胡万昌，均系早有借汉口铁路运送内地信件之事，现经查出，核与邮政铁路互议章程一、二两条不符，亟应设法禁止。惟必另订章程，俾挂号民局可将信包送交官局。由铁路寄送内地，方足以安众志，声请核示办法等因，到本总办。准此，查官局代民局由邮船运送信包，向已立有定章，必先到局挂号，其包均系按磅纳资，旋经数国在华纷设邮局，呼势变更，遂将民局包费豁免，业经申办有案。惟是邮船运送，不过由此口带往彼口，地属通商口岸，与内地情形迥殊。今代挂号民局由铁路运送包件，均在中国腹地，自不得豁免包费，应按口岸民局初定带包章程办理，每磅改照新章纳减费，以归复当日，树立基础之意，方为合宜。”

民国建立后，原为西方列强掌控的邮政主权被收回，但出于强化管理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的原因，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管控直至取缔民信局。1912 年，“上海各民局联

名禀请政府，要求寄递自由”，但被“交通部严行驳斥”，后虽然成立“上海信业联合会，希图抵制官局，卒无效果。”1921年，交通部颁布《邮政条例》，规定：“除认可之民信局视为代理机关外，无论何人概不得营邮局相同之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信局的取缔进程逐渐加快。1928年，“全国交通会议决议所有各处之民信局应一律取消”，后因考虑行业“员工众多，失业堪虞”，特别制定“民信局暂行挂号领照办法五条，俾遵章挂号领照之民信局得暂行继续营业”，但要求“其所收信件应作为总包计重纳费，悉交邮局递寄”。

此后，交通部加快了取缔民信局的进度。1933年令飭邮政总局，要求所有民信局在1934年年底全部停业。一时之间，各地民信业同业组织纷纷上书交通部，请求延期执行。交通部则认为“查取缔民信局，系为统一邮政起见”，且已“呈请行政院通令各在案，所请暂缓取缔一节，未便照准”。不仅如此，交通部还“呈准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军警机关，协助邮局取缔”，一时之间，“汉口、杭州、长沙、南昌、济南、徐州、宁波、苏州、常州、松江、温州、镇江等地同业，已由当地警局，循该地邮局之请，劝令必须于年内结束”。

从1935年1月1日起，交通部取消以前优容民信局的办法。再有不经邮局而私递信件的，就要拘捕。虽有几家民信局尚在挣扎抵抗，但终究到了没落时期。颇为玩味的是，民信局取缔之后，社会上却对其颇为怀念。1935年《晶报》刊发《民信局之回忆》，与其说怀念的是民信局，不如说是怀念优质的邮递服务。

注：本文系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开放性基金项目“近代武汉交通发展与城市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IWHS20213005）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 [1] 张樑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
- [2]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发行所，1940年。
- [3] 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信局》，中华书局，1984年。
- [4] 海关邮政总署：《宣统二年邮政事务情形总论》，1911年。
- [5]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邮政编》，1930年。
- [6] 交通部总务司：《交通年鉴·邮政编》，中央图书馆印刷所，1935年。
- [7] 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中华书局，1933年。
- [8] 东亚同文书院编：《中国经济全书》（第11册），线装书局，2015年影印版。
- [9] 仇润喜：《天津邮政史料》第二辑上册，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9年。
- [1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邮政》，科学出版社，1961年。
- [11] 张心澂：《中国现代交通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

王耀，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艺丹，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清末普爱医院的老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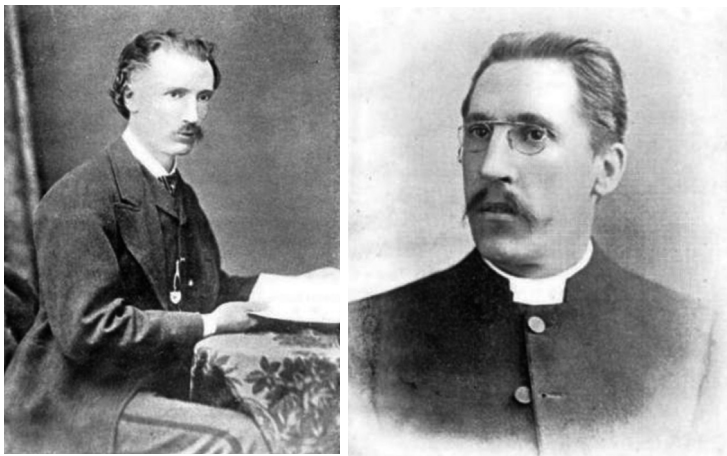
◇ 侯红志

汉口普爱医院创办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是武汉市最早的西医医院，解放后先后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工人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

笔者从旅英友人范榕先生处得到一本1909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著作《与循道会有关的中国医疗使命》，作者为英国牧师阿瑟·塔切尔，当年在汉口循道会医院工作。该书详细描写了普爱医院初创时的情况，所附46幅照片中有15幅与普爱医院有关，最晚也摄于1909年出书之前，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照片，涉及医师、接诊和一些社会情态，具有相当的影像史料价值。

费·波特·史密斯（中文名施维善），汉口普爱医院创始人，在英国汤顿危斯理学院接受早期教

育，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医院开启医学职业生涯，为医学博士。1863年12月10日，史密斯偕同妻子离开英国，乘坐“布罗克汉姆”号帆船，经过5个多月的航程，1864年5月17日抵达汉口，5月25日开始行医。



左图为费·波特·史密斯（F. Porter Smith）博士，华中地区医疗传教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右图为悉尼的R.H. 霍奇牧师



汉口男子医院（作者注：普爱医院1886年创设女院部，1890年兴建男院部，故有此称，下同）的外籍员工，包括R.T. 布斯博士、W.A. 塔切尔博士及布斯太太、塔切尔夫人等

史密斯在汉工作6年，1870年12月因病返回英国，1881年病故于故乡。

关于R.H. 霍奇牧师，在中国相关书籍资料上有的译为“哈启”，为普爱医院第二任英籍院长。

书中的如下文字，将创办普爱医院的目的说得非常直白：“‘使命’（注：传教、疗灵）先于医院存在，‘使命’本身即为目标，而‘医院’工作只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之一。然而，当两者结合时，便达到了最终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引导患者归向主耶稣基督。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医院病房这一场所，因为这里是播撒生命种子最肥沃的土壤。在病痛、悲伤和痛苦中，人心更容易受到神的影响”“通过我们在医院的工作，我



送来了一个“紧急病例”，一些在门诊等待治疗的患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们正在为未来大规模的宗教皈依铺平道路，这样的证词可以用来描述普爱医院在属灵工作和影响力方面的贡献”。

英国人在汉口的“疗身与疗灵”开始并不受中国人待见。普爱医院开始是免费治疗，其目的是通过医疗而达到传教，即通过“疗身”而达到“疗灵”。开始，他们给每位患者发放一个记录信息的小竹片，然而，这些竹片被人擅自出售，造成药房让粗心的病人吃错了药。后来，医院将竹片改大，并收取50英镑诊疗费。这一改进非常成功，“既杜绝了竹片的非法交易，又确保前来支付费用的患者是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人”。



汉口男子医院提供露天诊疗服务，与患者保持密切互动

图中医护人员在弹琴、祈祷。关于“疗灵”，普爱医院抓得很紧，随机而行，被认为是最具意义的服务：“为了方便行动不便的患者，每周日下午会在其中一个病房举行礼拜仪式。考虑到天气炎热时的实际情况，礼拜有时会在医院草坪上举行，以便患者能够通过担架参与其中。”图中左侧有警察装束的人士在场。

普爱医院以英国基督教卫斯理会（1931年改称行道公会）的理念至上，将“疗灵”放在首位，并着力培养华人宗教人士。右图的胡元喜是该院两位盲人传教士之一。1895年，这位街头卖唱的盲人被教堂成功洗脑，进入洋人办的盲人学校，12个月后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当初，“他的父母及八位兄弟姐妹因他皈依基督教而拒绝承认他是家庭的一员，并将他抛弃”，后来，“由于他的祈祷和影响力，他的家人以及前妻都已成为基督徒”。图中，胡元喜手持盲文《圣经》。

原文第85页：“在开始配药后的第8个工作日（作者注：费·波特·史密斯于1864年5月25日开始行医，第8个工作日应为1864年6月2日），他决定在院内竖立一块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招牌。为此，他



汉口男子医院的职员 W.A.塔切尔博士、R.T.布斯博士。前排左一为中国盲人传教士胡元喜

准备了一块大匾额，并题写了四个汉字‘普爱医院’。这所后来被称为‘普爱医院’的机构，其名称寓意着治愈与关爱。如今，这一铭文依然镌刻在我们医院入口处的石碑上，同时还有其他六个诊疗区域的入口标识。在过去的一年中，成千上万的患者在这里得到了治疗和慰藉。事实上，这家医院早已成为中原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字。各类患者带着难以想象的病痛纷至沓来，每当药房开门时，他们便寻求救济。起初，医院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经验的积累，运营模式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左图的曾先生是汉口男子医院的副院长，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右图的盲人传教士胡元喜先生在大卫·希尔病房为病床上的患者诵读《圣经》

The Mouth of the Han

the Concession, which was over three miles away.

Eight days after commencing the dispensary work, he decided to erect a sign-board in true Chinese style. So a large tablet was prepared with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engraved:

院 醫 愛 普

YUAN Hall XI Healing AI Love P. U. Universal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

This is the sign which to-day is engraved in stone over the entrance to our hospital, and also over the portals of six other 'courts of healing,' through which, during the year, thousands of sick and suffering pass in search of relief. In fact, it may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name' in the centre of China.

Crowds of patients, with every imaginable and unimaginable complaint, would seek for relief every time the doors of the dispensary were opened. At first no fee was charged, but experience soon wrought a radical change.

85



大卫·希尔和贝内特病房的开幕仪式于1902年6月6日举行

书中说：“一座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拔地而起，其中包括一间大型手术室、一间研究实验室以及两间宽敞的病房，每间可容纳20名患者。此外，在庞德区域还增设了一家洗衣房。这两间病房以大卫·希尔的名字命名为“贝内特”。它们设计合理，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并能在夏季保持凉爽，冬季则温



从汉口教会大院鸟瞰乌龟山（龟山），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院的围墙、花园以及原生房屋的屋顶

暖舒适。开业当天令人印象深刻，英国领事将军夫人弗雷泽受邀出席并主持了开幕仪式。”

1894年至1904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普爱医院的汉江对面建成汉阳铁厂。书中写道，“我们的位置（与铁厂）非常便利”。汉阳铁厂“带动成千上万当地人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许多工人不习惯操作复杂的机械设备和大型建筑设施，因此频繁发生严重事故，几乎每天都有事故发生”。张之洞因此与普爱医院经常接触，“即此类案件应由我们医院负责接诊”，给很多铁厂的伤者提供了医疗诊治。为接诊方便，当地官员“主动提议并出资为我们医院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将我们与城市的三个关键地点连接起来”。

在这张照片上，除了“福荫中华”“风高和缓”几款贺匾，引人注目的还有房屋中的两座轿子。据书中记载，当年，这些英国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几位康复的患者向汉口男子医院赠送了贺卡（匾），专门献给医院的医生们，以表彰他们的卓越贡献

传教医生发现汉口居民对坐轿的官员非常敬畏，于是也常备轿子出门乘坐，以“震慑”当地人。

阿瑟·塔切尔牧师认为，清末的中国是“一个深受此类迷信影响的国家，人们往往将所有疾病的根源归咎于超自然力量，而非自然规律和科学治疗方法”。他在汉口地区看到了“许多经历此类灾难的家庭会选择邀请道教牧师举行特别仪式，以安抚愤怒的神灵，驱散甚至摧毁邪恶的影响”。

图中是一座露天戏台，台上应在表演一出古装戏，英文图解中“平息天花神灵的愤怒”，可能源于演出有祭神去邪之意。

书中记载左图“一张当地人体模型的照片，该模型陈列于‘外治’医生的店铺中，用于演示上述 367 个穴位中的部分位置。然而，这种野蛮且缺乏科学依据的治疗方法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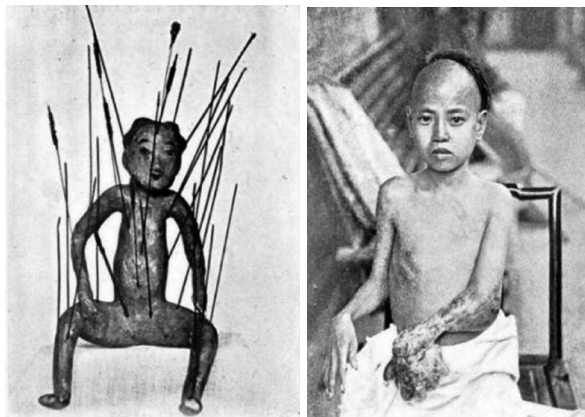


汉川的露天剧场是为了平息天花神灵的愤怒而建造的

今仍常见于一些药房和医院”。书中写道：“无知的‘外行’医生胆敢用烤肉串作为针灸工具，导致成千上万人致残，甚至过早死亡。”

中国传统的中医针灸术至今还在施行并行之有效，但我们所见的针灸针具很小很细，图中的针灸这么“粗壮”并非烤肉串，应是以箭来醒目标示穴位并显示威力。由此看来，本书中的一些内容，有对中医“妖魔化”的一面。

侯红志，退休前为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左图由 Rev. J.S. Helps 提供，展示了一具用于针灸的人体模型；右图中的男孩因针灸事故导致手臂受伤并接受了截肢手术，于汉口男子医院接受治疗

驰援响水沟：“一个都不能少”

◇ 朱伟峰

逆行出征

2008年，我在驻汉空降兵“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部队任炮兵营政治教导员。5月12日上午，我正回江西老家休假，与家人享受难得的团聚时光，谁料当日中午14时28分，四川汶川突发8.0级特大地震，山河震颤。

当晚得知部队即将飞往四川抗震救灾，归队的念头在心中翻涌。为追上部队，次日一早，我购买南昌到成都的机票，想直飞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可到了机场才知客机全部停航为救灾让路。我当即改订火车票，一路辗转，终于在什邡市与部队会合，随即投身

到什邡市与绵竹市交界的龙门山一带的救援工作中。这片受灾最严重的土地，处处是坍塌的房屋，声声是悲恸的哭喊，容不得我们有半分停歇。

5月19日中午，向汶川地震遇难者哀悼完毕，我带着部队继续在绵竹市金花镇幼儿园清理房屋废墟。金花镇党委书记耿坦合跑过来，找到团政委朱建军，报告响水沟磷矿还有3名腿部骨折的受伤矿工被困山里，生命垂危。情况紧急，朱政委一边向师指挥所报告情况，一边吩咐我立即组织突击队进山紧急搜救。

响水沟又名三尖角，因山顶三座山峰并肩而立得名，地处深山老林，磷矿洞纵横交错，本就山高坡陡，地震过后更是山体塌

方不断，道路被乱石堵死，地形复杂难辨。何况余震不息，山洪、滑坡、泥石流暴发的危险如影随形，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更使救援环境雪上加霜，每一步进山的路，都踩着生死线。

没有犹豫，我当即决定从全营党员骨干和身强体健的战士中挑选突击队员。消息一出，几个连队的干部纷纷抢着参加，很多战士主动请战，眼神里满是坚定。考虑到还有其他任务，我最终挑选了8名士官骨干和3名义务兵，其中6名是党员，体质都比较好。可事后我才知道，反坦克导弹连代理排长、三级士官蒋建东正患感冒，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自己偷偷地吃了点药。事后我批评他“隐情不报”，这个只比我小两岁的老班长憨厚地笑了，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着去救人，我自己都把生病的事情给忘了。”多好的战友，多美的“谎言”啊！

短短10分钟，11名突击队员就齐刷刷地站在我面前，神情肃穆，整装待发。为了减轻负重，只携带了3天的干粮和水，以及指北针、望远镜、地图、电台、手电筒、砍



过激流

刀、救援绳、背包带等装备。师长杨杰从指挥所赶到现场，仔细检查准备情况，考虑到深山丛林中电台信号不通，他调来一部“北斗一号”给我们。谁也没想到，这部设备后来成了我们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纽带”。杨师长详细交代了救援注意事项，特别是险情处理方法，并进行了战前动员。

一切就绪之后，一种悲壮的情怀油然而生。没有太多告别的话语，在“要保证安全”的反复叮嘱中，副团长刘卫荣带着我们徒步翻山，向响水沟磷矿开进。

生死营救

从金花镇到响水沟，要途经红白镇，还要闯过被称为“死亡峡谷”的龙宝坪。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到处是塌方，几十吨重的石头滚落到路上，将坚硬的路面砸出几米深的大坑。有的砸在过路的货车上，生生将其压成面包状。很多桥梁都垮了，铁轨严重变形。我们不仅要在乱石堆中艰难寻路，还要时刻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的突然袭击，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路艰难跋涉，终于在晚上8点半左右抵达龙宝坪。这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村，震前住着十几户人家，群山环绕，宁静祥和，如今却成了一片死寂的废墟。天色已黑，夜幕如墨，而到响水沟还有10多公里。为了安全起见，刘副团长和我商量，决定当晚就在龙宝坪露营。队员们捡了一个空投的伞衣搭成临时帐篷，四周还在不停地滑坡，山上的乱石轰隆隆滚进山谷。我们吃了一点干粮后开始休

息，但大家完全睡不着，就在帐篷外面烧了一堆篝火，说说话，迷迷糊糊到了天亮。

20日凌晨5点半，考虑到后续支援和对上联络的需要，我向刘副团长请示，他留在龙宝坪指挥，我带队前往响水沟。刘副团长不同意，要亲自带队去。我反复劝说，讲明留守的重要性，他最终才答应带两个通信兵留下，负责通信保障。

出发前，刘副团长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人救出来，一定要把所有的人安全带出来！

我故作轻松地说：“你放心，我能不能出来我不能保证，但我一定会让被困的伤员和突击队员活着出来，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不行！”刘副团长厉声打断我，眼神里满是坚定与牵挂：“一个都不能少。你小子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坚决完成任务！”一句承诺，重逾千钧，互敬军礼握手告别，我带着突击队员向矿区出发了。

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们一路摸索前进，比进山时更艰难。山更高，坡更陡，到处是乱石堆砌的石山和山体塌方形成的堰塞湖。我一边探查路线，一边鼓励队员加紧赶路。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到达，矿工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终于在8时45分，我们赶到了响水沟磷矿。我带领队员一面仔细寻找被困者，一面不停地喊话，期望有幸存者响应。一个濒危的矿洞传出微弱的声音，电筒照射发现有3名矿工被困在一个矿洞深处。突击队员迅速在四周察看地形，发现该矿洞大部已塌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供人员爬行而入。



抬着伤员跋涉前行

我立即带领蒋建东、杨佳明、王利均3名队员向矿洞深处爬去，发现3名矿工均不同程度受伤，行动不便。队员迅速背上矿工向洞口艰难返回。不料余震袭来，矿洞不断摇晃，磷石纷纷滚落，有好几块碎石砸在队员身上。就在我们全部撤离矿洞不久，整个矿洞全部塌陷，3名矿工抱住队员们泣不成声。

在矿洞外，我们一边给3名矿工进行简易的包扎处理，一边安排军械员傅江华带3名队员销毁在矿洞口放着的残存炸药，还派出搜救小组对周边矿井进行搜救，最后在附近的城墙岩磷矿中，发现一名蜷缩在地上的矿工。他的头部被砸出两个血洞并化脓生蛆，已察觉不到生命体征。经随行向导确认，这名矿工名叫赖元平，我们就近挖了坑，准备将他就地掩埋。

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瞥见赖元平的右手食指，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以为是幻觉，擦一下眼睛后再仔细一看，又没发现什么。我不放心，“一个都不能少”的叮嘱犹在耳边，赶紧叫随队军医再检查，捕捉到还有极



给赖元平喂营养液

其微弱的脉象，有存活希望。军医进行紧急处理，包扎了头部，喂了点葡萄糖水。我让队员砍了几棵粗壮的树枝，用背包绳编制了一个简易担架，抬着他向集结地走。

生命奇迹

归程的路，比来时更加艰险，堪称步步惊心。塌方形成的堰塞湖水越积越深，沿路做的路标记号有的已找不见了。走到一处号称“鬼门关”的大峡谷时，地形和环境让队员们大吃一惊，只见左边是不断塌方往下掉大石头的悬崖，右边是不断下泻的泥石流，中间是一条地图显示20多米深的河流。往哪里走？大家看向我。“你们休息片刻，我先去观察一下。”

我带着蒋建东到最前沿勘察路线，发现左边塌方相对较少，于是决定往左边走。虽然走右边的河道会轻松些，但是有两大风险：一是怕淤泥下陷，二是怕山洪暴发。

就这样，我们一边躲避着不时滚下来的乱石，一边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背着伤员，硬闯这300多米长的“鬼门关”。刚走到一半，正对面河道上方的几百个立方的泥土，轰隆隆塌了下来——如果刚才选择河道路线的话，十几个人就全部“交待”了，我们不禁一身冷汗。“快走！”我一个劲地要求大家加快速度。刚走出这段“鬼门关”，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身后尘烟升起，先前大家站的地方又一次被乱石

完全掩埋，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赖元平由于脑部受伤严重，脊椎错位严重，医生嘱咐必须保持平稳，但坡陡路滑，只好上山时前面的队员跪着向上爬，下山时后面的队员坐着用臀部往下挪，全然不顾膝盖、臀部磨得血肉模糊。

在通过山洪冲刷之后形成的淤泥地时，为了防止陷下去，4名队员跪着爬过40多米的路程；过河的时候，水深且急，为了保护伤员不会掉进水里，我让两名队员先蹚过



返途（右一朱伟峰）

河，用绳子拴着担架，后面8名队员护卫着同时抬起来，就这样连拖带拽地终于把伤员带过了河。很多人的鞋子都灌满了泥沙，大腿被尖石撞伤，脚被泡得发白并磨破了。大家心里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伤员送到龙宝坪等待直升机……队员还不断地呼喊赖元平，“一定要坚强”“家人正等着你回家”，防止他睡着昏死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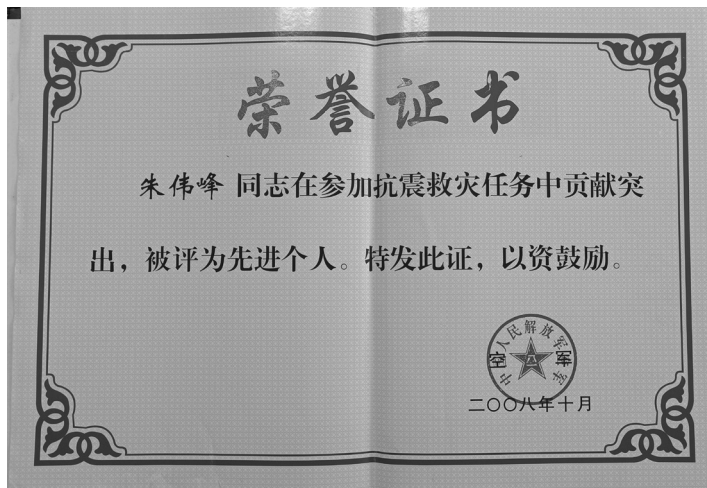
历经艰难的5个多小时，中午1点50分终于回到龙宝坪。刘副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可把人带回来了。每过一小时我就要到路口去看一趟。”话语里，满是掩不住的激动与牵挂。

受伤的矿工黄伯明和肖永军说：“如果不是解放军，我们不困死在山上，也会疯掉自杀的。”刘副团长赶紧用“北斗一号”向指挥部报告情况，联络直升机。军医给赖元平输液、喂葡萄糖、加盖棉被，其他伤员也换夹板、消毒伤口。

傍晚时分，救援直升机抵达，我带着4名伤员和4名志愿者及军医上了飞机。晚7点左右飞抵绵竹市255野战医院，当晚给濒临死亡的赖元平做了开颅手术。他在断食断水且严重受伤的情况下，存活196个小时，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也是我们所有人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最好见证。

事后，刘副团长告诉我，我们乘坐的直升机起飞时，巨大的气流将降落伞帐篷掀翻，留在龙宝坪的战友们只能等下一架直升机。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短时间内直升机来不了，刘副团长带着大家冒雨重搭简易帐篷，在深山里又宿营一夜。

那一夜的龙宝坪，依旧凶险万分，到处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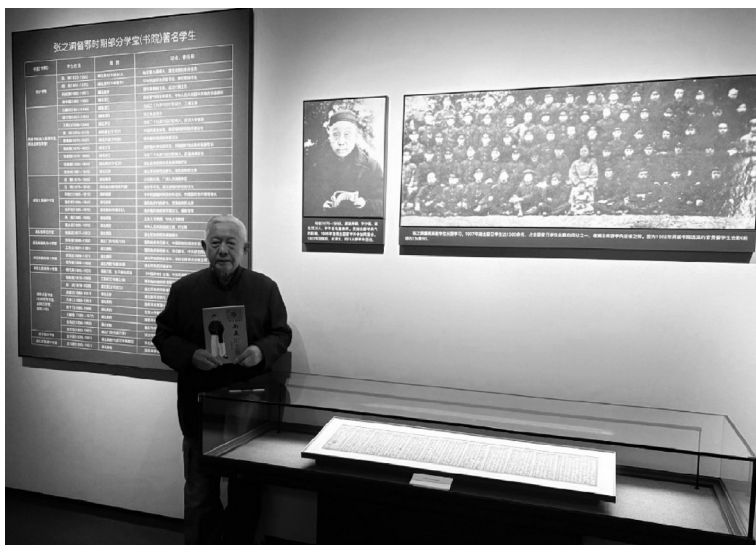
是塌方的声音，时不时有乱石落到身边，大家不敢入睡，基本上是坐着熬通宵。第二天上午天气依然恶劣，直升机还是过不来。刘副团长毅然率领大家徒步行军，21日下午2点多安全返回到部队驻地。

5月22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通过手机连线采访了我，在断断续续的信号中，我报告了救援赖元平的情况，引发全国人民的关注，主持人赵普说我们创造了生命救援的奇迹，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朱伟峰，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处处长，本刊副主编

祖父一封家书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 向虎雏



作者在湖北省博物馆“向岩家书”展柜前

3月13日下午，辛亥革命博物院副院长袁磊告诉我，在近期馆藏文物定级评估中，“（清）向岩家书”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这封“1906年6月1日向岩家书”，披露北洋海军“海军公所”牌匾深藏在日本靖国神社内，其内容有利大家认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2010年，我64岁了，决定退休，以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因为我的祖父是辛亥先驱、抗日英雄。

祖父向岩，字少蓍，同治十年（1871）生于湖北汉川。冯天瑜先生在《为什么盛赞向岩先生？》（《冯天瑜教授纪念诗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26年）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祖父的：

（一）向岩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健将。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12年民国推选大总统

（孙中山1911年12月就任的是临时大总统），向岩在报刊发文，宣布竞选总统，并力陈自己比袁世凯更有理由担任民国大总统。一位独立公民提出这种民主共和诉求，史无前例，这是民初宪法的一次辉煌践行。

对中国乃至亚洲庶民竞选总统第一人致敬！



历史学家冯天瑜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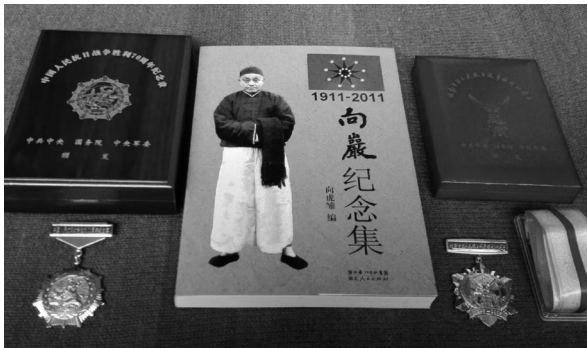
(二) 抗战初期，向岩动员乡亲，组建抗日武装，以高龄文士率众在华中腹地苦战日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向岩，高度颂扬这位真豪杰。

对勇赴国难的民族英雄再致敬意！

拙作《辛亥武昌首义史》(1984年出版)初次介绍向公；2012年题写“辛亥志士抗日英雄”以赞向公；今日又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于条幅之上，字拙而意切，以赠向公哲嗣、吾友向虎雏教授。

晚生冯天瑜敬书

戊戌桂月于武昌珞珈山



《向岩纪念集》

我拿什么来迎接辛亥百年？除了编纂出版《向岩纪念集》，向国家捐赠祖传家藏文物，是我作为辛亥后裔表达心意的最朴素方式。因此，我先后向辛亥革命博物院捐赠：

- 1.《我们的曾外祖父向岩》铜像(梁晶晶塑)；
- 2.祖父研读的大伯父向泚(“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荣获者)从苏联回国所送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
- 3.武昌亚新制图社出版的一套三本硬质封面地图集；
- 4.“莽苍庐藏书”木质书柜；
- 5.镌刻祖父字“少蓓”的铜墨盒；
- 6.民国元年祖父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使用的“中华民国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空白办公用笺一张。除此之外，我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全国各地为辛亥革命博物院引进近千件(套)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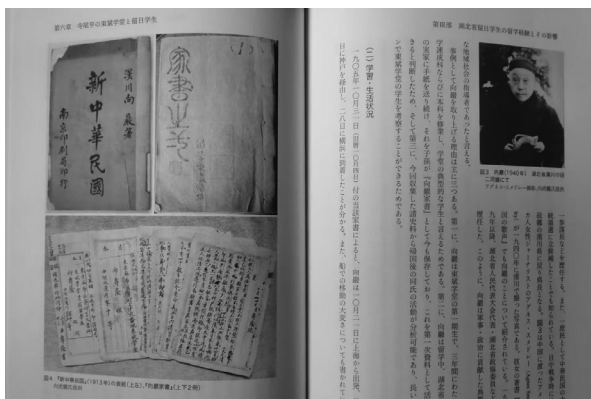
在祖传家藏文物中，最重要的则是一封“1905年12月10日向岩家书”，记载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祖父赴日求学未及一月，日本政府颁发《取缔留学生规则》，8000余中国留学生集体停课，决心归国，不许一人留学日本。湖南籍陈天华恐众人团体不坚、不能反抗到底，孤身夜投大森海而歿，以觉醒众人之志。事发两日，向岩在此家书中告知家人，学膳费及书信不要再寄东京，因次月初就要回国。他在信中感慨：此一事也，实我国兴盛之起点，仇对日本之大纪念碑也！呜呼，中国可以不亡矣！

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当天，我和女儿向菲一起再次捐赠了另一封重要的“1906年6月1日向岩家书”。此信长达12页，详细记录了日本明治天皇观兵炫耀武力“使人仇愤”的情景，特别是在靖国神社发现李鸿章题写的北洋海军“海军公所”牌匾——这是甲午战败存世的重要实物。

“男就数月来自所亲见，足以壮人心魄，增人艳羨。而使人仇愤者敬为大人陈之：

西历四月卅日为日本明治天皇观兵之日，男等全学堂皆同舍监去参观，其地曰青山练兵场，离男等学堂不远。是日有马步炮兵五万余人，观者十余万人。天皇乘马车，衣戎服，面目微黑而瘦，与其画像不同。腰挂长刀，身披宝星，同二孙一女共坐一车，太子立于车后，皇后太子妃各乘一车。天皇车中并未施幄，人人皆可看见，但日本人民于其车过时欢呼万岁而已。其余亲王殿下、海陆军大将、各部大臣以及文武百僚、各国钦使，无不皆至。其兵则步队在前，马队次之，炮队又次之，军容之肃，军纪之严，即马亦指挥如意。其前后数日内，又在彼所谓二城桥地方，盛陈列军械，将七万枝毛瑟枪，五枝一架，成列成行，占数十亩田大，所谓枪林者诚不过是若也。又有所夺俄国之炮及本国之炮数百尊，沿于枪之外边。并将夺自俄国之长短刀刃，用铁丝如编栅状，其长不知其几许，中有大小炮弹堆积如山。

又五月初间，日皇例祭战亡军士，未祭之前数日，命人将柏叶缚为半球形，上树红日之旗，以电灯为经纬线，隐喻东亚霸王之意。其祭所即在彼国之靖国神社，神社内藏甲午之役所夺于中国之物最多，并有“海军公所”四字之匾额，系李鸿章手题者。观其兵威之状，军备之富，君民相亲之乐，为之



“向岩家书”收入日文专著



辛亥革命博物院馆藏文物定级评估现场

羡慕为之称雄。及观靖国神社之事，使人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复仇之念勃然而起也”。

鉴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祖父著作《新中华民国》孤本已经风化到不可挽救的窘境，我担忧这封已 120 年的纸质书信终会自然氧化，直至消失……近年来，我时常走进红楼回访这封信，已然为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清）向岩家书”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我高兴万分，多年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这封百年家书的安全有了法律保障。

甲午唤醒中国。祖父“向岩家书”的历史价值，在 120 年后得到肯定，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通史展“极目楚天”专柜，并由中国学者收入日文专著而远播日本。甲午祸患，永世难忘，将激励子孙后代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向虎维，武汉大学教授，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副会长